# 觀察

每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每份價三千元

第二卷　第二十一期

## 專論

**我們對于大局的看法與對策**　楊光特　葉毅　孟慶淵　陳序廷　葉蔚華　虞世蘭　車載　唐揚　吳奇策　吳文烈

**我們向那條路走？**　陳旭麓

**論中國的土地改革**　施若霖

## 討論

生活與文化　「期待東方的文藝復興」　馮大麟

道德上有個毒刺　費孝通

## 觀察通信

北塔山事件發生後的迪化政情（迪化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四平解圍之日專機視察報告（瀋陽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湖南省參議會旁聽記（長沙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 週末闢欄

言論自由與自律　吳世昌

## 文藝

談伍光建先生的翻譯　戴鎦齡

## 讀者投書

政府封鎖大學畢業生的出路　被殺與被辱　陳明仁的鷂子　因地制宜稅　變

## 觀察漫畫

##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啟元
呂復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寳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賽
戴鎦齡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雋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費孝通
楊絳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蕭乾
顧翊羣

## 政府封鎖大學畢業生的出路

編者先生：今年大學畢業生的出路大成問題。內爭不息，各項事業不能發展是個重要原因；政府變本加厲的抵制大學生又是另一重要原因。

本來政府錄選人員，究查其人之言論思想，早非新鮮事。「典試規程」中的「閱卷規則」且有「文字內容態有反動思想者」「閱卷人須報告典試委員會」的明文規定。我最近被拉夫替某項特種公務人員考試命題，發見其「口試標準」也列入「政治思想純正」一條。不過據說除去明文規定外，今年各級政府和所屬事業教育機關，不謀而合的暗中對大學畢業生，又拉起一道堅固的防線，大約除非能拿出充分的身份證明，否則錄用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這種作法，能說是對大學生罷課反內戰的事後懲處，意思是「看你們以後還敢胡鬧不敢！」

高壓流血政策之外，這一着是政府對學生更高明的手段。高壓政策流血政策已令我們從事教育的人寒了半截心，這個封鎖政策尤令我們從事教育的人灰盡了心。政府化在大學生身上的錢不能算少，然而既成全他們畢了業，不設法用他們，反堵死他們的出路，誠不知居心何在，既然怕學生滋事，何如把大學一齊關門，既省錢，又省事，豈不大好！

嚴仁賽　七、三、　杭州

## 因地制宜稅

編者先生：七月二日福州中央日報載中央社訊：本省各縣縣參議會通過呈請財部核定之因地制宜稅，現已陸續獲准，並已由省轉飭各縣開辦云：從此各縣可以依法因地制宜橫征暴斂。民國萬稅，小民苦矣！

徐、行　七月五日　古田

## 被殺與被辱

編者先生：再過幾天，就是本校故教授聞一多先生的周年祭。聞先生的死，我們都認為沒有白死。他的精神，充沛在我們每一個同學的血管中，過去這一年同學們的行動，可以作證。

近日看上海來的報紙，知道上海各大學教授因同情學生而將被解聘者達百餘人之多。像聞一多先生和北方各大學別的先生，決不會發生解聘這個問題的，一方面他們有古代士大夫可殺不可辱的氣概，另一方面北方教授的地位和學校當局辦學的態度，也使野心家決不敢有此妄想。在表面上，解聘自然比暗殺客氣得多。但是在侮辱教授，破壞教育尊嚴這一點上，卻猶殊得多。號稱自由主義者的南方教授，如果不團結起來與惡勢力抵抗，結果非把所有大學變成蒙校不可。

解聘之舉如出於校長，則這樣的校長根本應該去做官「行憲」。如出於政府壓迫，而校長竟不拒絕，那樣的校長與獄吏無別。至於把這些教授解聘了天下是否就太平，現在的當局尚不夠能力考慮這類問題。

李文平　七月九日　北平

## 陳明仁的鬍子

編輯先生：今天（十日）字林西報首頁載有四平街之戰的照片兩幀。上面一幀是交通大廈破毀的殘跡，下面一幀是四平守將陳明仁等四位內戰英雄的玉照。陳明仁被圍二十日，鬍子長得很濃。據說陳將軍決計將這鬍子留起來，作為四平之戰的一個紀念。我覺得陳明仁將軍這一簇鬍子，可「稱」為一「內戰鬍子」。未知先以為如何？

余紀澤　七月十日　上海

## 變

編輯先生：有人常常拿「窮則變，變則通」這兩句話來論斷事理，把這句話視為至理名言。我卻認為變也有種種的變法。有的是變質，有的是變形；有的是變好，有的是變壞；有的是皮毛的枝節的變，有的是徹底的根本的變；形式的皮毛的枝節的變，都是不通的。以我國的情勢證之，窮則窮矣，變則變矣，可是愈變愈是不通了，就是這個緣故。

就小者言，如政府的法令，瞬息萬變，朝令夕改，其變可謂多矣。然而愈變愈使人民叫苦。以徵兵的情形來講，過去是除了少數有錢有勢的可以倖免之外，其餘的適齡壯丁，大家都親自參加抽籤，他們把命運決定於神，決定於天。他們不管是自己入伍或是出錢給鄉保長替他們買壯丁，總還覺得比較甘願。而現在徵兵，卻不要壯丁自己抽籤了，全由鄉保長和劣紳們包辦。究竟誰抽中誰未抽中，那只有天曉得。鄉保長常常祕密地通知那些有錢而無勢的人（有錢有勢的例外），說他是中了正籤；且等到大批的鈔票送上手時，卻又無事了。可憐那些既無錢又無勢的小窮人，往往在充壯丁鬼不覺的深夜裏，被人抓去送多少人。又如田賦的整理，不知花了神不知力和物力從新清丈過，但是結果流弊並沒有減少，而且加多了；三兩畝田的貧農，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活動，賦稅大都加重了，但富農卻至少減輕了一半以上，甚至減輕了十分之八；他們除了一些田地沒有清丈之外，並且把清丈過的用了個「去七留三」的辦法，因此在清丈單上所保存的，就只有實在數目的十分之三了。當然他們也不是沒有化過代價的，他們除了請清丈員吃雞喝酒之外，還要送一筆賄款的。於是清丈田畝的結果，不獨勞民傷財，而且稅收沒有增加，流弊反而加多了。

謝瑟然　七月二日　漵浦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四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本期零售：每册三千元。
訂閱：平寄先付四萬元
掛號航空先付五萬元
附註：訂閱時請註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二卷第廿一期
三十六年七月十九日

本期作者

楊光時等十人：(投稿)
陳旭麓：(投稿)
施若霖：(投稿)
馮大麟：(投稿)
費孝通：清華大學教授
吳世昌：中央大學教授
戴銘齡：武漢大學教授

# 我們對于大局的看法與對策

## ——正告美國

楊光時　葉毅　孟慶淵　陳序廷　葉蔚華
虞世蘭　車載　周揚　吳奇策　吳文烈

我們認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關係的失調，以及緊張、對立，都是一種無法避免的現象！蘇聯的體制自已成一類型，對于一部份人當然是非常不安的。全世界擾攘緊張的局面，也可說起因于各個自由主義份子間，對蘇關係的許多不同主張，與不同看法。

華萊士以爲戰後的蘇聯需要安定與建設，一切美蘇關係的惡化，完全起于自已的做法過分刺激蘇聯，更認爲惟有全世界的繁榮與安定，始足以阻遏共產主義的發展；因此他主張「對蘇和平」。杜魯門總統則基于許多實際的經驗，事實告訴他這一盟邦行止莫測，難能應付，爲了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張，以及確保世界永久和平，不惜對國外反動政權大肆援助，以爲這樣才足以使蘇聯知所戒懼；這就是「對蘇强硬」。

這兩種看法都是危險的。在此時此地的局面下，侈談「對蘇和平」固屬無濟于事，且足以助長共產主義的氣焰，但大量援助反動政權，加重法西斯氣息，亦非所宜，徒引起全世界自由主義份子的反感，甚至逼上梁山，增厚共產主義實力；不但勞而無功，結果適得其反。

我們以爲蘇聯欲謀共產主義的擴張，其形式也有兩種：一是以自已國力直接擴張，換言之，就是希特勒式的侵略。一是培植全世界共產勢力，造成各國內戰與革命，從而取得政權，形成間接擴張。對于前者，我們認爲蘇聯無此存心；莫洛托夫曾經主張裁軍，以及史太林對小羅斯福、史達森等的談話亦可表現。對于後者，最近蘇聯「世界革命臨時委員會」的產生，無異是戰前「共產國際」的一種復員。實際上蘇聯的動向是不難測知的。

今後美蘇直接衝突，或國際間發生大規模的戰事，其可能性甚少。各國內部「內戰」的可能性加多。因此第三次世界大戰或許不是國際間的戰爭，而是「內戰」的蔓延連成一片，變成全世界「普遍內戰」的戰爭。「化國際戰爲內戰」，使原子彈無法應用，這就是蘇聯造成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二大特色。

所以我們認爲應付蘇聯的方法，一切公開指責，以及爭辯、否決、給與取，甚至援助反動政權，都是無效的。全世界的反動政權因了他的貪污腐敗，促使「人民」與「政府」離心。幫助反動政權，

就是與全世界人民敵對！我以爲美國今後的外交使命，不僅是「國」與「國」間的正當外交關係，同時必須覓取一種「方式」，以促進美國政府與全世界自由主義份子及其政黨間的聯繫。這種「方式」就是「民主國際」。惟有通過「民主國際」的方式，大量援助全世界自由主義份子及其政黨，始足以眞正解除共產主義的威脅。惟有「民主國際」的設立，始足以迅速地與「共產國際」對抗！

全世界的自由主義份子皆在窮困中，爲了反抗貪污腐敗的政權，不惜走上了左傾的道路。這是一股偉大的力量。美國政府如能覓致一種「方式」，以與這種「力量」相結合，則美國的政策就可以眞正操縱全世界！

我相信沒有「共產國際」的策動，中國二十餘年前不會出現一個「共產黨」。沒有越飛、鮑羅廷的來華，中國不會產生一批有名的左傾人物。同樣，沒有「民主國際」的設立，中國暫時不可能茁起一個國共以外的強大政黨。沒有民主美國的經濟支持，中國也暫時不可能出現一個司徒大使期待中的新革命運動！

從經濟觀點上說，青年黨依附國民黨，民主同盟依附共產黨，是必然的。中國政黨的經費已無從設法開源。孫中山先生昔日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完全依賴海外華僑的支持，然而二三十年來的後果，已使華僑對祖國的革命運動灰心！

誠如張東蓀教授所說，只要美國不幫助反動政權，中國自由主義份子向美國特別拉緊些是可能的。中國必需產生一個國共以外的新勢力。我們相信祇要獲得美國的保證，一個超越馬克斯主義的思潮便可產生。

司徒大使屢次發表願望說：中國必需再來一次新的革命運動。我們不應看作這是司徒雷登先生的隨便談話，我們熱烈的期待着牠形成更具體的對華政策！

# 我們向那條路走？

陳旭麓

語云：「窮則變，變則通。」中國當前的局勢，已屆山盡水窮，正需要「變」，事實上亦在「變」，只是交叉於十字路口，不知變向什麼方向去。處處是可通的路，處處又是不可通的路。因爲各有去的方向，你不同意我走的，我不同意你走的，互相阻擋，擁塞在這交叉路口，亂做一團，開交不得。就是殘存着指路的標記，也被血肉塗抹得看不見字迹了。然而擺在眼前的，究竟是些什麼走不通的路呢？概括言之，不外「武力統一」「和平統一」「革命統一」的三個去向。這三個去向的阻力和可能性又到底怎樣？

（一）武力統一，就是勦滅政策。本來中國歷史上各個朝代統一局面的形成，莫不是用武力打出來的，那一個開國皇帝不是南征北討身經百戰的英雄？漢高祖之所謂「馬上得之」，足够代表這種武力統一的英雄氣概。同時一個朝代裏要是遇着了反對勢力的出現，政府惟一的對策是勦滅。如果反對勢力一天天的擴大，勦滅不了，最後只有自己毀滅或肉袒請降的一條路，讓新興的武力建立起新的統治朝代，所以說「天無二日，人無二王」，決沒有二者並存的和平政制。今日的政府，不容諱言是沿着這一條老路走。甯漢分家至於「七七」前夕以及所謂「國民革命」的完成，一直沒有改變過這一個趨向。自勝利以迄於現在，雖然政治解決國內的糾紛高唱入雲，實際只是有權者的遁詞，拿政治來搪塞，做做美麗的幌子而已。去年十二月，國大開幕頒佈憲法以後，連這幌子也給撕去了，只是礙手礙脚的沒有把討伐令明白的公佈出來。依據六月二十九日最高法院對毛澤東下的通緝令看起來，已是破釜沉舟滅此朝食的辦法，這個通緝令也就等于歷史上討什麼檄一樣。但是我們要明白這里不是討伐式的檄文或命令，而是叛國有據的通緝，從法律上找到根據，雖只是文字上的出入，卻也說明了武力統一的動搖性。所以中國歷史上遭遇了空前的比期，也是整個民族

的一次大考試。這考試是否可以拿着及格以上的分數，突破兩千年來的因襲，還有待於我們的努力。徵之二十年來的鬥爭經過及當前的許多客觀事實，這一歷史傳統是在發生蛻變的作用。第一，兩個政治集團都握有充分的武力，雖有衆寡强弱之殊，而在戰爭過程中的盈虛消長，預示一種均勢的出現。第二，國際上美蘇兩大潮流，反映于國內的鬥爭更趨尖銳化，在精神或物質上可獲得相當的奧援，五十年前朝鮮的新舊黨依附于中日的兩大勢力，結果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劇，如果我們繼續的陷入不可拔的泥淖中，不能自己把握自已的命運，則我們國家的形勢將由美蘇的決鬥來決定。第三，戰事一日不停，國家財政和社會經濟只有糜爛而至于崩潰，任何緊急措施都沒有用處，這是武力統一最不可憑藉的一點，同時却又是反對力量最可憑藉的一點。第四，由於官僚政治的無能和顢頇，人民普遍的不滿現實，尤其是知識階級中多數自由份子已寄希望於新生的政治力量，無疑的這是武力統一者不可彌補的損失。在這樣的情形下，勦滅政策因爲自已和環境造成的牽制，反給予反對勢力一種生存發展的保障。曾經有人問到美國政府所承認爲自由份子的中國當局：「這樣的打下去，政府是否有把握？」據說他只是搖頭嘆息。爲什麼硬要打這樣沒有把握的仗，因爲要保持過去的光榮和現在的面子，可是他們沒有想到面子將有更難堪的一日。

（二）和平統一，要使兩個獨立的武力集團融合在一起，而且融合之後，不是一的擴大，而是數學式的一加一等於二（中共要求否決權意即在此），確非易易。中國過去雖然有過「周召共和」的故事，究竟他們不是冰炭不相容的政黨，只是一個主子下的兩大重臣合作的來輔導天子治理國家，自然不難。現在要使兩個仇深似海又握有武力的集團攜起手來，除非出現奇蹟；這奇蹟正待我們去創造。不過我們怎樣去創造這一個奇蹟，能否創造出這一個奇蹟，實在需要着人類最大的容忍和最大的智慧。去年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雖未能盡如人意，却用過高度的智慧和努力，確是一種成就。可是這一場努力僅是曇花一現，轉瞬間變成了歷史上的陳迹。從表面上看起來，和談確是千頭萬緒，有不知從何處談起之苦，實際不外軍隊國家化和政治民主化兩大主流，這兩大主流就是由分裂達到和平統一顛撲不破的定律。但是怎樣使歷史傳統的個人軍隊或政黨軍隊變爲國防軍，怎樣使一黨掌握或獨裁的政權走向民主的實踐，還是癥結之所在。一年多來，許多愛國之士及中間政團舉出過不少良法美意的方案，無奈忠言逆耳，絲毫不能打動黷武者的心。改組後的政府，不但沒有改變本質，遑形式也原封未動，似乎戰爭的悲劇將無終止地演下去，一直要演到曲終人散的時候。現在關內關外的烽火擴大得不可收拾，四平街的爭奪戰，死亡枕藉，慘絕人寰，沒有死亡的人，也正向着死亡的路上走，這到底爲了什麼事！許多人說要打到兩敗俱傷，彼此明瞭了誰也不能消滅誰的時候，和平之門才可重啓。有些熟悉中國情形的美國人士也是這樣的看法；Nathaniel Peffer 在「細看中國」一文裏說：「中國的內戰不免還要繼續一年半載，然後政府才會再度發現共產黨是消滅不了的；而中共也會明白縱令全國性的崩潰也不一定會使他們獲得政權，然後和談也許可以重開。」（觀察二卷十八期）如果現在還沒有到兩敗俱傷的階段，到底還要多久才能達到這個死裏求生的標準。假使在加深了痛苦之後，他們真的可以產生智慧，人民到希望痛苦高度的發展，縮短痛苦的時間，藉以獲得和平的日子。然而上兩月的和平呼籲，盛囂塵上，立法院和參政會有過熱烈的討論，全國學生有過如荼如火罷課遊行的表示，在這些呼籲和平者的感覺，目前已迫臨最危急的階段，因爲人民已經不能再苦下去了，如果沒有了人民，任何的政黨都要失敗的。然而握有和平權力的人始終幹着與和平背道而馳的工作，他們對血肉糢糊的戰屍，家破人亡的難民，熟視無睹。因爲他們都不敗不傷，敗的傷的正是他們不過視爲戰爭工具的老百姓！

當馬歇爾離開中國時，會寄意將主席領導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建立民主的新中華民國。前些日子，伍憲子氏在大公報上發表的時局主張，贊同蔣主席辭去國民黨的總裁，處於超然的地位，做各黨各派或全國的領袖，國共雙方的所役軍人都脫離黨籍。這並不是伍氏的創見，早就有人作如此主張。但這僅是一種願望，沒有絲毫可能的迹象。

說來國共的合作是這樣的困難，但是北伐和抗戰的輝煌成就，不會經有過並肩作戰的事實嗎？難道他們的友誼只能同患難而不能同安樂？可是目前的局勢，安樂的道路已被內戰摧毀得一乾二淨，各處的變亂，複雜的外交關係，尤其值得我們警惕的，麥克阿瑟一手扶持的日本，咄咄逼人。尾崎竟主張以公民投票來決定滿洲、台灣、琉球、朝鮮的命運。他們已如何蠟睨勝利的中國！興念未來的國家民族，大家也應該回頭了，一味的僵

持下去，只有同歸於幻滅。然而國府總動員的命令已預示今後是一個怎樣悲慘的局面。

（三）革命統一。革命是人類歷史的突變。構成人類歷史突變的因素：第一，社會財富的集中，少數人利用着特殊的手段，掠奪大衆的資本和勞力，砌成自己的金字塔，驕奢淫佚，無所不用其極，而大多數人却在水深火熱的死亡線上掙扎。因此貧富的懸殊，社會關係極端的尖銳化，一邊是暴戾殘忍，一邊是仇視報復。第二，社會經濟的發展，需要在新的基礎上建立起新的系統，不能不澈底的掃除廢墟，重新建設。今日中國的社會情形，是否已經具備了這些突變的因素？我敢肯定地說：今日的中國社會沒有一處不是火藥庫，較之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前夕有過之無不及。據統計數字，百分之十的人口，佔百分之七十的土地；百分之九十的人口，僅佔百分之三十的土地。這個估計縱然不能說絕對正確，但土地的集中是有目共覩的事實。筆者所知的一個販賣商人，二十年的經營，擁有兩萬担稻穀的田地，都市中所佔的房屋不下百所。僅是一個純粹的販賣商人業已如此，官商的勾結和豪門資本的壟斷更可想而知了。生活指數較戰前已漲至二萬五千倍，公教人員的薪給還停滯在兩千倍，這樣的畸形發展，這樣無底止的腐爛，確已屆於澈底改革的階段。某部長說：「二十年前我們革人家的命，想不到現在人家要革我們的命了。」這是一句沉痛的話，由此我們看出中國現階段不但有着革命的事實存在，同時也有了革命的恐怖心理。且自十七世紀末葉以後，世界各國先後完成了工業革命，大踏步前進，中國始終在帝國主義和封建殘餘的枷鎖下，沒有獲得適當發展，勝利後似可解除一切的枷鎖，然而枷鎖的鉗制，仍有需要革命的手段。

今日企圖推翻社會制度的，無疑是中共。我們要推究源委，何以有革命的背景而不能完成其任務？就社會的腐爛面看，誰也不能否認這種需要。可是現實的陰影限制着歷史的發展。第一，中華民族依然沒有擺脫不爲已甚的儒家思想，一切都以中庸之道爲社會是非的標準，革命的過激行動，是不合于中庸之道，人民過着了橫逆和暴戾，只有擴大他們的忍耐性；自然也有忍耐到不能再忍耐的時候。第二，自鴉片戰爭百餘年來，中國人民無時不在戰爭的蹂躪和恐怖中，尤其抗戰八年後，人民實在需要一個休養生息的機會，所以他們所祈求的是過些和平的日子，厭戰的心過於望治之切，視革命爲畏途，談起中共，大有洪水猛獸的看法，寧可咬緊牙根吃苦，沒有勇氣革命。第三，革命的對象，却也有一些值得原諒的地方，尚未達到土崩瓦解之勢。第四，官僚政治的腐敗，雖已招致「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的詛咒，但封建殘餘和外力扶植，給予了相當的維繫力。第五，辛亥革命是人民難忘的教訓，三十餘年來除了戰亂外，什麼都沒有。在這樣錯綜複雜的社會關係裏，所以產生出的革命力量無法使革命一氣呵成。同時知識份子中的不少自由主義者，知道這個社會要「變」，也希望「變」，澈底的「變」，却有一個共同的觀念，以爲不要用流血的革命方式去「變」，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務。這不是不可能，英國的工黨執政以後，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來挽救資本主義的危機，似乎已經收到了相當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國來，是否也能收同樣的效果？何况中國兩個武力集團的對立，怎樣使他們放下武力，和衷共濟的改造社會？由近來局勢的發展，除非上帝給我們好好的安排。

從上面許多事實的分析，武力統一已遭到了國內國際的阻力，革命統一也受着種種的限制，或者說尚未到瓜熟蒂落，和平統一又是那樣的飄若驚鴻不可捉摸，似此中國只有在戰爭的混亂下，永墜浩劫不能自拔。然而人類歷史應該不會這樣的伊于無底，總得有一個交代。這個交代到底怎樣？似乎還有待事實的證明。王芸生先生在「中國時局前途的三個去向」一文裏（觀察創刊號），他認爲除了革命和平的途徑外，可能走向南北朝的對立，各據半壁以自雄。曾經有人主張國共分地而治，即是促成南北對立的局面。然而南北對立的可能性究竟怎樣？我是否認有這一個去向的。因爲南北朝只是統治權的鬥爭，與今日政權和民主的爭取大異其趣。統治權的鬥爭過程，到了誰也不能打倒誰的時候，只有各守原有的防地，互相羈伺。中國歷史上已經出現了不少的這種場合。但是當前的形態是錯縱復雜的，被不同的信仰和勢力打破了固定的空際範圍。例如中共原來建立在陝甘寧的邊區，但極南的廣東和海南島也有過他們的勢力。就是政府的自身也未必盡是眞正的政府主義者。所以在聯合政權的形式出現了以後，只有戰爭或和平的兩個途徑，戰爭則包括勦滅和革命，和平則不出於聯合政府的範疇，絕不能有不戰不和的執中辦法。

人民是迫切地在祈禱和平，希望嘗一點安寧生活的滋味。如果和平不可能得，只要能用快刀斬亂蔴的方式，不問其爲勦滅或革命，陣痛之後，即可獲致安寧的局面，則戰爭亦有所希望。若戰爭徒惹成長期的紛亂，打箇你死我活，依然不能解決問題，還要從和平求出路，則目前一切的決策需要有智慧者的重新考慮，不要讓歷史鑄成了不可收拾的大錯。

三十六年七月六日

# 論中國土地改革

施若霖

## 一　中國要工業化先要解決土地問題

封建的土地制度如不能改革，中國工業化是不可能的。

一定的社會階段的生產關係是應該適應其某一種生產力的。這一種生產力不斷地發展的結果，它會和這生產關係不相調和而引起衝突，必然要求解脫後者底束縛而起改變作用。

我們要建立一個民族資本的工業社會，必須將原來的落後封建社會底束縛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加以揚棄。我們應該理會工業社會的生產力是機械工業，它否定了過去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手工業資本。它底生產是大量的商品，這裏必須具備着足以消納的廣大市場。因而構成廣大市場的廣大農民，他們底商品購買力自非提高不可。如果這些農民仍舊爲超經濟的剝削所束縛而不足以自存——他們無法去解除封建土地關係，則工業商品運輸關係因無購買力之故也無由確立，雖然有着良好的新生產工具和技術，也因這個落後的社會制度的阻礙，而無法運用。

其次，工業化的生產，需要鉅量的品質純一的原料，和農民可以自由選擇其農作對象，以適應市場。這就是一個土地制度的問題，它必須適應於生產大量品質一致的原料以滿足工業飽和的要求，而現實的土地制度便是不能如此自由提供的。

這現象的存在，其咎實應歸之中國的小農經濟制度，每家農戶的耕地面積，抗戰前平均不過〇•二五公頃，農場的條塊劃分，不齊於歐洲的中古條土制度，戰後的情形則更爲慘然。另外，地權的急劇地集中於地主，自耕農大量喪失着耕地，更使土地問題愈趨嚴重。

復次，工業化需要資本集中，足供有強大的生產資本的累積，過去卽使現在因爲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地租的超經濟的掠取，祇造成了農村經濟間歇期的崩潰，談不到什麼工業化的資金。在官僚買辦的政策中，祇有單獨借外債發洋財的一個手面，以爲除此之外，實在沒有發展工業的其他途徑。

我們承認傅斯年的呼籲：如：「某某等官僚資本，以每一家族單位底財產而論，已足够全國四萬五千萬同胞一年的舒適生活而有餘」等的說法，這些官僚底財富單位都是以美金計算的，他們祇投資於南美橡膠園咖啡園豫備作下野度其寓公的張本；即使他們可能純以民族資本的姿態出現着，家國社會的財富祇集中於二三個豪門大家族，這樣的寡頭資本政治是否於老百姓有利？何況他們這些豪門都是民族資本家底死冤家；近頃輸入管委會對於本年第二季輸入限額的公佈，依然扼斷着工業界生存的咽喉，引起了他們極大的不滿，就是小小的例子。

事實上是：這幾年來，歡迎外資、外國原料而引起的不良成果，祇促使中國陷入眞正殖民地的道路；而我們所要建立的工業經濟，是獨立的民族經濟，絕對不是殖民地經濟。不論某一個國家願意大量投資，我們也不能無條件全數地接受，因而使中國陷於萬劫不復，貽禍於中華子孫。政府抗戰八年的人力和經費，百分之八十以上來自農村，在今日，我們如要提供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經濟來源，也非自廣大的農村不可，非自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同胞不可。

在這裏，我們決不是依然運用封建的佃租關係來剝削榨取農民，我們的要求，必須是合理的——那是根本的適應時代洪流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是封建社會踏入到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一個惟一的大前提，捨此而憑空大談其改善土壤，消滅害虫，改良種籽等等，實無異於隔靴搔癢，捨本逐末。

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的戰鬥已達二十個年代，他們兩黨關於土地問題的鬥爭，迄今已到達非常尖銳的階段。誠然，大部的農民利益代表着整個中華民族的利益，在這廣大的農村的殺伐的戰場中，他們也無非要獲得廣大農民的同情和擁護。

在這裏，誰最能徹底實行土地改革，便是誰最能獲得廣大農民的同情

利務論，而民之獲得在農村中的戰鬥勝利。我們很中立而無庸諱言地說，中共在逐步的土地改革上，是相當堅强了他們底經濟和軍事基礎的，在激烈的內戰炮火下，中共能夠與國民政府分庭相抗，未嘗不是農村人民之力。他們為了最後勝利，實踐了土地改革。國民黨則為了他們一部份地主階級利益的立場，對於土地改革總是因循姑息，遲遲其行。

土地改革實在是彼此競爭的目標，內戰的雙方勝敗實繫於此。廣大農民的利益，無疑地必由農民羣來作取捨的選擇；在此千鈞一髮時期，國民黨的進步份子已在呼喊着「實行土地改革之時機業已來臨」了。政府長此拖戰下去，兵連禍結，民不聊生，軍事上既無絕對把握，經濟上政治上幾乎已節節敗退下來，弄得千瘡百孔，民怨沸騰，人民的「反饑餓」「反內戰」「爭自由」「爭民主」即使在都市中已有燎原之勢，更已博得了市民層甚至上層份子的同情，這種崩潰的危機將是一觸即發，當局決不能剜肉補瘡或徒事高壓便可以安度難關，除非他們根本改變了一成不易的官僚買辦政策。

作為一個外國的中間人物瀰却爾．林德賽所作刊於美國基督教的刊物「基督教與危難」上的「中國問題能解決嗎」一文，有着這樣一節：

「中國共產黨自然是馬克斯主義者，但他們是具有恆心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相信祇有等中國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工業化社會後，社會主義才能到來，這一時期的來臨，至少要再過幾十年的發展，而且在這發展過程中，自由企業該發生重要的作用。在目前的經濟政綱中，共產黨比官派國民黨政策所給予自由企業活動的範圍更為寬廣，使有效的合作成為可能的；另一因素是在大部份的中共政策中能覓到的反官僚主義的傾向。……中共在接近政治組織這一點上總是從底層開始的——建立起羣衆的組織，建立起選舉出來的村議會和縣政府，用村自衛隊（它保證了地方權力的眞正轉移）來代替了昔日的警察和憲兵，以及其他措施……這種通過羣衆組織和地方人民控制的方法是很有效的。革新的措施眞正地被實行了，政府是忠誠的，而且就中國水準來說，是很有效率的，農民中政治覺醒心也很快地成長了……國民黨官方的政策，原則上也承認地方自治政府、土地改革等等，但是他們以行政統一性和執行法律等等作進行這些改革的先決條件。就某一限度說，也可認為是一種保護既得利益的說明。……」

林氏語重心長，倒是一面客觀的鏡子，宜為一些勇於內戰者來「攻我之錯」的。

## 二　中國土地應該怎樣改革

中國的土地改革，實在是一個悠長而艱苦的行程，我們體味所謂土地改革，好像必須連帶所謂激烈的革命方式；然而依據客觀的現實，不論共產黨也罷，國民黨也罷，中國的土地改革，確實已嚴肅地放在現實之前必須予以迅速解決，再也不能因循姑息，拖泥帶水的了；否則，將必是拖帶到一條歷史的滅亡的泥塗之中去，要是某一個當局昧於理智不敢正視的話。

我們承認，對於這個中國土地問題，不是一蹴而幾便可迎刃而解的。它也不純然是個武力革命問題，也不是一種强暴專制所可屈服，最後，也不純是一個被作為黨爭消長的懸的（在農民本身利益上講，這是必然的歷史課題）；而是關係於整個中國之命運的一個大大的問題。

中國土地應該怎樣來改革呢？筆者以為必須按照下列幾個步驟做去，纔能有效；一個力求生存發揚光大的政黨統治團體，當了困難的面，決不能畏葸逃避故意歪曲而自以為得計的。

（一）火速停止這個消解國力的內戰；政治力求民主，打倒一切的改革障礙——目前搶救教育危機的各地學潮已澎湃，如火如荼，他們已喊出了國人的要求，免於恐懼，飢餓，不虞匱乏，反內戰，眞民主。這種垂亡的吶喊必然跟着政府危機的深刻化而更廣大普遍；這運動的引長必然會引起了搶救經濟危機，搶救職工危機，搶救企業家危機，搶救一切的中國危機，……更泛濫的搶救運動，使全國民衆團結了起來向着一個目標前進。那時候的政府怎麼辦？還不是乘早來個釜底抽薪，迎接了老百姓的要求的好：「和平」！簡單得很！應該剩餘些力量來和異黨作着政策上的競爭才是天經地義的事。在和平之後，才是國民抗戰八年後眞正的安定蘇息，一切田賦徵實，徵借，抽丁，拉夫，苛捐雜稅，通貨膨脹，經濟危機，才能統統解除消滅；起碼條件所謂安居樂業才能在農村和都市中實現。否則隨便怎樣的政府改組，錦囊妙計，都是不可靠的揚湯止沸，飲酖止渴。凱末爾是一代英雄，與他底民衆畢竟呼吸相通，訂定國民約章，驅逐他們的

敵人於小亞細亞之外。他固然獲得友邦的幫助，但他終是一個獨立自主國家的領袖，領導土耳其走向復興的大道。他懂得自己國家是一座國際和平的橋樑，而不是雙方殺伐的蟹蟲。在內戰及將來的國際戰中重重犧牲，他便熄滅戰火提倡文教，使土耳其大放燦爛之光。

我們中國當然不一定要效颦這屬於歷史範疇的土耳其革命，但反觀自已連加拿大甚至戰敗後的日本都萬分不及，他們對於基本的土地政策倒已比較滿意的解決了；二次大戰後的捷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南斯拉夫，波蘭，他們這些小國家的本來社會經濟與中國很多相似，邇來都已普遍實施土地改革。我們不可以學學他們嗎？還是得讓別人家强迫改革着？

（二）先要建立最合理的中國農村佃租關係——第一步就要眞正的減租減息。封建的地租是一種超經濟的剝削，投資土地的利潤，超過了正常的工商業的收穫，商業資本祗與高利貸結合，這是國家的致命傷，祗有在封建社會及殖民地社會才有此現象。農民在高利貸與高地租高農料的壓迫下，甚至無法維持農家必須的最低生活；即使有一些剩餘的農產品流入市場，也祗被中間的商業經營者以低價壟斷收買了去，農民實在無法進一步來享受工業市場的工業製成品。所以不得不實行減租減息來保障農民，使其生活合理化，以求繁榮社會。所謂二五減租只是一個現實的初步要求。（政府的「綏靖區土地處理辦法有過去欠租一律不得追償，今後租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的條文，但看實現了沒有？土地一待收復，地主們都追隨在軍隊之後重新播下階級仇恨的種籽，各地區的報章通訊可以復按；而且這些命令祗公布於所謂綏靖區，難道還是收復後的綏靖應付的權宜之計嗎？）

同時，進一步必須使勞苦功高的農民生活趨於安定，應將「永佃權」予以確定和限制；同時，還要强制限定地租率使之不得任意加租；由此可讓佃農安心於耕作，墾頭改良佃耕，與土地打成一片。（綏靖區中地主往往沒收佃農的佃權，甚至侵佔他們一部份所有的自耕地。）

（三）施行耕者有其田的澈底改革——要解決土地問題，最澈底的辦法，祗有將土地重新分配與直接耕種者；減租減息不過是權宜之計，耕者有其田才是最直截了當的方法。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不僅僅屬於扶植自耕農的範疇，它應該超越了這種範疇的單純的意義，即凡是自己不耕而保有領得耕地「永業權」的自耕農，也在禁止之例；自耕農擁有廣大的耕地，從事工業化的生產，那祗蹈入美國農業資本主義的覆轍，因此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中否定了自耕農個體的擴大，對於美國農業資本制度有很嚴厲的指責。

這種土地改革的理想，實在是實行經濟民主的基本條件，它把封建的超經濟剝削所依附的基礎整個地推翻了。

地主階級所有權的基石是年代悠遠而不易動搖，要實行這個方策，當局必須運用極度堅强的手腕與纖密的步驟來處置。二次戰後，歐洲較落後的一些國家，甚至美國佔領下的日本，已有許多土地改革方法可資借鏡。

（四）改革農業經營方式，建立農業產銷合作制度趨向集體化——由於土地所有的集中和土地使用的分割，造成了小農經營生產方式的悲劇；它限制了農業技術的革新，不能從事於機械化的集體農業，走向工業化生產和再生產的道路。這勞動力過度的疲乏的運用，使之十分黏着於一定的土地上，只便利於封建地租和超經濟的剝削，而形成了高額的地租；正因爲如此的生產關係，就限制了生產力的進展，阻礙了經濟社會的進程。現實的要求是：只有用集體的農業工業機械化經營方式代替小農經營，生產才趨於合理化，封建的土地形態才由此而解體。在這裏，更要進一步地從事農業科學技術方面的改進，對於地大物博的墾荒問題應予研究解決。

至於確立農業產銷合作制度，這是由個體農業經濟趨向集體農場生產的橋樑，使保守的耕地工作者團結一致，有組織地從事於生產與消費合作，基於自發自動的要求，一切的農業技術改進都有把握，理想計劃易於實施，農業的生產方式一切趨向合理化；在過渡中可避免生產的盲目、不規則、市場壟斷和再生產資本不够累積、運輸不便利等等的弊病。這裏要注意的是鄉村自治機構的推動助力和本身的健全，合作農場組織力和教育工作的普遍，也是重要的一環，要這一環能够堅固，才不致爲土豪劣紳與中間商所假借和再行得勢。

（五）實施平均地權的極致——土地公有——所謂平均地權，就是凡是人民都有平等使用土地的權利；大地上的利益，人人都可憑藉他底勢力

而得均霑收益，這是中山先生底土地政策的精華，（耕者有其田也屬於這個範疇）而出之以和平的手段假之以一定的期限，蔚爲大成的。

至於由此進一步的要求，則爲土地公有。它是一切土地政策的極致，也是中山主義的遠大目標，它同時必須以土地公營作爲內容，配合着中國的政治條件和技術形態才有實現的可能。在這裏，必須顧到公共的利益和農業工作者對於土地耕種利益的熱心。

政府在這場合，一方面把土地公營事業盡力發開，另方面則須由國家土地金融機構盡力統制自耕農集體農場，領導着走向合作經營的道路上去；這種集體農場，正是一個土地公有的橋樑，保持了自耕農不致鬧成耕者有其田與一切公有的衝突的苦悶。

另一方面，必須由上而下地防制官僚機關的形成，免得一般土劣官僚假公濟私，創造出新的特殊階級來。

上面所敍述的關於土地改革的一些設施，實在並不是一種空中樓閣的理想，它應該是個歷史的必然的課題；假使在現實的環境裏還是一種奢望的話，那末這個現實倒是一個悲劇。

卅六年五月廿四日

# 「期待東方的文藝復興」

## 與陳衡哲先生論『需要重來一個「人的發見」』

馮大麟

在當今，如仍沒有全盤反省和澈底自覺，眞太危險而可怖了！

這一個多災多禍的世紀，這一個多風多雨的季節，有心人，有識者，早看出時代的大難文化的危機和人類的厄運，已如瘋冥欲至的八方風雨，飄然來臨。

一年以前，當代赫赫政治家邱吉爾於訪美途中，曾發表過一段轟動世界的演說，首次指出這次戰後和平空氣之太缺乏，不是一個好的朕兆，如比照現局發展，三次大戰可能迅速來臨，其結果原子戰使地球表面重回復原始狀態，一幅慘澹的劫後世界畫面將宛然臨現目前。當時一般人多以爲邱翁危言聳聽，有意渲染時代的猙獰面目。但最近之最近，當代思想家羅素，在其向全球廣播的和平論一文中，曾這樣動人地說道：「羅馬帝國時代所會遭遇的厄運今日可能重演，然而結果是很顯明的，除了一些小國尚可僅存外，人類的文明將遭遇到全部的毀滅，人類智力的錯用將招致新的危機，死亡與受難是不可免的。」這經過兩年來歐亞各地的肉搏內戰，美蘇間的暗鬥明爭，雖不能說他們預見的充分正確，至少已證明這不是缺乏根據的無稽興歎。

歷史確已走到不可不全盤反省和澈底自覺的時候了，橫陳當前的時代問題，在原子世紀航空時代天下一家的今日，早不是你我一已獨善其身的問題，也不是你我一國獨善其後的問題。在時代的安排上，像羅素所說：「今日我們只有在整個毀滅及繁榮之中任擇其一，中間的路線是不可能獲得的。」處在這歷史的十字路口上，不是我們將時代問題總解決，邁向入和平繁榮的路上，便是人類作自殺性的競賽，陷入自我毀滅的深淵。這不是我們有意作驚人語，新的戰爭意義，在今日科學技術的水準上，乃已非城地的攻佔，或霸權的爭奪，而不折不扣地是人類盲目地扮演全員自殺的大悲劇。

要終止這全員自殺，唯一而可能的道路是：「全盤反省澈底自覺。」不幸這赫赫當頭的活現實，却爲這時代的人所抹殺、忽視、遺忘，眞是這世紀第一件不幸的事。

讀六月八日大公報星期論文，陳衡哲先生『需要重來一個「人的發現」』一文，在這風雨滿原無邊動盪的時候，陳先生從全盤反省澈底自覺中提出這一新的期待，不失爲有心人的深遠呼聲。本來「人之發見」和「世之發見」是西方文藝復興的兩大總綱，也是他們反省和自覺的結果。陳先生以爲文藝復興時所發見的「人」，已因近代知識的喧賓奪主和物的征服

，變爲太阿倒持，又引領受命，匍匐在地下，聽候物的屠宰了。這是現代人類文化的嚴重危機，要挽救它只有從兩個初步工作標誌做起：一、認識問題在於恢復人與物間的主賓地位；二、努力的憑藉，他提出「回到哲學去」，從以人爲中心的中國哲學裏發掘新啓示，再發見一個「更美更善更能運用知識與物力的新人。」

遠在二年以前，當歐亞兩戰場烽煙尚未消散之際，個人目擊亂離，感發時會，曾對中西文化與時代問題作一根本的檢討，批論舊事，判析新知，最後歸給貞元之道於「人之發見」與「世之發見」，期待在東方再來一次文藝復興。今日陳先生提出需要重來一次「人的發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一新時代的到來，已如嶺梅之乍開，在暗香浮動處，早透露出春之消息了，生處今日，其能無興感！

不過對陳先生的意見，我們覺得還有兩點應商榷的地方；第一近代世界中「人之沒落」，陳先生以爲是由於知識的喧賓奪主和物的征服變爲太阿倒持。但依我們的看法，這祇是近代「人之沒落」中幾件大端犖犖的文化事象，不是眞正的根本原因。要抉發其核心原因，在方法上，還應從歷史的探溯着手。若用一個文化史家的眼光來分析，我們會知道「人」之沒落由來久了，當文藝復興之初，在主觀因子和客觀條件上，早就注定了「人」之沒落的必然命運，這以後的三四百年間，不過把當初潛伏而隱的邏輯演出和露骨發揮，我們倒不必對現時代無端驚奇。本來文藝復興，所以能孕育後此的科學文化，在主觀因子上，實由於主知主義和感覺主義的得勢，在客觀條件上，則由於唯物主義和機械主義的繁興。不過，主知主義的發揮，雖使科學分析得到無邊的惠賜，但滔滔不平的人類情感被壓抑了；感覺主義的流行，雖使科學實驗得到主觀信仰的支助，但幽邃蘊深的直覺性靈，則爲之掩蔽不彰。他們的極端態度，對摸不着看不見、不能分析、不能理解的東西，都予以保留，甚至乾脆加以排斥。以後唯物主義和機械主義充分成熟，就自造成一近代人所有的天地；唯物主義，化原萬有，歸結於物，絲毫不承認精神世界的存在，機械主義，強調必然，信持命定，根本否認自由領域的實有。他們的人生觀是唯物的，世界觀是機械的，這就是文藝復興所發現的「人」和「世」，今日科學上雖有相對論量子論不定原理等新學說的產生，但唯物主義和機械主義的傳統霸局，並未根本推翻，祇在認識微波上激起一點漣漪而已。文藝復興所發見的「人」和「世」，既這樣不脫唯物的窠臼，他們所知所行自難逃這唯物的天地。這不是他們對「人」無所知，無奈所知的都是人的自然之性，也不是他們對「世」無所見，無奈所見的都是宇宙層次中物質世界之一部分。在這一番迴照反觀之後，我們眞不能不太息於近代人褊狹的盲目追求，及對人之所以爲人的眞際知道太少了！「人」本不祇是一有血有骨有性有慾的動物，「世」也不祇是一團黑漆的物質結構，然而近代人却要執拗地生活在這一可憐的小天地，他們盲目地追求物的知識，到頭來却對於人之道生疏茫然了，他們努力於物的征服，最後却惑然於怎樣才能使人免於受物的毀滅。所以近代「人」的沒落，不是由於知識的喧賓奪主，而是近代對「人」的知識太貧乏了，自己不認識自己有應用物的知識之優越能力。同時，更不是由於物的太阿倒持，以原子能爲例言：「原子能」在人類未利用它造原子彈時，並未對人類發生輕微的損傷，乃剛剛相反地，地球上第一次原子能的利用，其目的却在「人」之毀滅，這那裏是物毀滅人，實人自毀之。尙書說：「天作逆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今日人受制於物的局面，確非天降之禍，乃人作之孽。總結說來：這一代的險局亂象，自文藝復興發見新「人」新「世」後，已早播下遙遠的種子，正如蔣方震先生在文藝復興史上所說：「文藝復興實人類精神的春雷，一震之下萬卉齊開，佳穀生矣，稗莠亦隨之以出」。當今「強淩弱」「衆暴寡」「有諸已」「無諸人」「以物毀人」「人自毀人」的動亂世界，正是文藝復興所出的稗莠。若是我們不甘作時代的犧牲品，觀往察來，則今日急急待做的時代工作，就在澈掃這非同小可的文化稗莠。

其次，對問題解決的路向，因爲前提認識的不同，我們與陳先生的主張也兩樣，陳先生只提出需要重來一個「人的發見」，我們却進一步期待一個以「人」和「世」的發見爲骨幹的新文藝復興之到來。本來「人」與「世」原有不可解之緣，宛似連理雙枝，並蒂芙蓉，有「人」的自覺即有「世」的發見，新「世」是新「人」活動的天地，沒有新「世」，新「人」即無安頓處。這我們若稍察看一下文藝復興「人」「世」消長的轉折，當能會心了悟爲什麼哥白尼的新宇宙觀會被教會目爲邪說，甚督教的天國會爲科學家斥爲荒誕，此中原因無他，即在舊「世」中無安頓新「人」的

地方，新「世」中無舊「人」活動的天地。所以單純的「人」的發見，非時代方向有錯誤，乃在這祇是理論家的自我想法。至世界上的任何文化民族，如其能在歷史上建立一獨立自成的文化體系，大都有其所自覺的「人」，和所發見的「世」；在中國，論「人」，有倫理化的以修身齊家爲本的「人」，論「世」，有道德化的循環的宇宙觀；在印度，論「人」，也有宗教化的持修出世的「人」，論「世」，也有迴輪雜多的大千世界；至古希臘的充滿阿波羅（Appollo）精神的人，和物格化的宇宙觀，也都各有其特殊面目。世界上任何文化沒有不是因「人」緣「世」和合而成的。「人」與「世」正是這社會文化間架的中心骨幹；一新社會的建立不能無「人」與「世」總其綱，一新文化的創造也不能無「人」與「世」發其緒，一時代大局的開拓又往往有新「人」新「世」啓其先，一時代混亂的結束亦往往有新「人」新「世」殿其後。「人」與「世」與時代社會的關係眞太密切了。今日中國，今日世界，都已面臨一絕續轉變的關頭，在在需要發揮反省工夫和創造魄力，在這舊「人」舊「世」已不能打開新時代之門時，去發現新「人」和新「世」，以上振百代之敝，下開千世之流。

這個新「人」與新「世」的發見，我們叫做「東方文藝復興」。它的時代意義，除終止人類全員自殺，結束一代混亂外，至少可由以下兩方面來說：

一、西方文藝復興已完成其歷史使命，需待從新啓示中發見新的「人」和「世」，重開西洋文化的紀元。

二、中國在百年文化大變局之後，需要由新「人」新「世」的發見，展開一偉大的文化運動，以綜合「東」「西」，融鑄新舊，造成一波瀾壯闊的東方文藝復興。

先考察第一方面。原初西方文藝復興的涓涓狂流，本是由古代人生方式思想方式和藝術方式的再生，乃激起新「人」的覺醒和新「世」的發見，這一大發見的意義太重大了，一面它結束了中世紀的教權時代，一面也揭開了近代文化之巨幕。不過，所謂新人的覺醒，乃由靈到肉，新世的發見，乃由天國到大地。自始就染上主知的感覺的色彩，和唯物的機械的情調，從此他們的眼光，不再上視，迷途於蒼蒼者天的神聖玄祕之中，不再下視，在如火如荼的地獄之前戰慄前進，也不在內觀，探討那些確定性很少的問題。在一番覺醒後，他們開始肯定地把大地認爲是人類自己的，好像生活在初春的晨光裏，微風在盪漾，百鳥在噪鳴，感覺到一種初脫離教會樊籠而生活在大地的快樂，可以縱橫奔馳，可以放任自由，可以從自然世界裏獲得無比的權力，可以任意在大地上建立科學的世界。但文藝復興自始即有這先天缺點，佛利德爾（Friedell）在現代文化史上批評說：「文藝復興是第二次的人類眞正墮落，所產生的全是一批自我享受的俗人，文藝復興的最大缺點，就在沒有心靈，在今日看來，還並不是過火的描寫。順着這巨流推進，到了主客因緣充分成熟的時候，不但人生觀宇宙觀是唯物的，而全部知識系統也成了科學全書的同義詞，「自由意志」「道德法則」「人生價值」都變成了應予否認的東西，文藝復興所發見的「人」和「世」，到此已面臨山窮水盡的末途。記得第一次大戰後，東方西方都會喊出一片西方文化沒落的呼聲，當時國內嘈嘈滿耳的怪論，以爲西方文化的天下已告結束，今後是東方文化的天下，我們要抬出孔老夫子去救西方。實則在明眼人看來，西方文化，如能有新「人」新「世」的發見，前途正方興未艾，以四書五經的符咒，來解脫而今厄運更難驗靈，要重開西洋文化的紀元，根本之道，還在於徹底自覺根本反省，去發見新文藝復興的綱領——「人」與「世」，這是世界文化發展要這一代人完成的歷史任務。

第二方面：中國在百年文化大變局之後，一片荒涼蕭瑟景象，呈現目前，舊的已經破壞，新的尙未建立，西方的新文化我們雖會鏗鏘雜沓地一團介紹進來，但總不易成長生根，在今日中國，一面我們的舊偶像已經打倒，一面新權威還未樹立，一面廣大農村已瀕於崩潰的邊緣，一面新工業的種子還難望成長茁壯，一面舊皇室雖早已推翻，一面官僚傳統的惡弊却深植於今日官場市府，一切脫節，一切矛盾，眞是決堤開閘，難勝其害，捨舊從新，不堪其煩。在這個文化失調時代，我們太需要有一個文化復興運動了。但如對幾十年來的文化運動作一番回溯，又不能不令人大大失望，最早由洋務運動談起，曾國藩張之洞對中國現代化的辦法，都是「食瓜遺子」，「中體西用」，錯誤重重；維新運動，新車舊轍，舊瓶新酒，也只有處處碰壁；五四運動，在形態上雖然似錦如荼，波瀾壯闊，但「五四」的成就，也只限於西方新思想新制度的介紹，和中國舊文化舊重心的毀

滅，時代的尖峯，始終未超過吸收西化和破壞舊制的極限。

這裏，有一點應駁辯的事實，就是有不少人把「五四」運動看成中國文藝復興，胡適之先生於民國二十三年在芝加哥大學刊行「中國文藝復興」（Chinese Renaissance）一書內，就解明採取此一看法，他以中國新文化運動與西洋文藝復興類似之點有：「一、這自覺運動在以有生命的語言，去代替古文而創造新文學。二、這自覺運動在反抗傳統文化的禮教，從舊勢力下解放出個人與婦女，……最後，這個新運動在以歷史的新批判方法，去研究文化傳統。」因而即率直認爲五四運動是中國史上的文藝復興。我們以爲五四運動，雖曾作了一番反省工夫和自覺工作，但深度和廣度都太嫌不够，不能與文藝復興擬比。文藝復興的核心意義，是新「人」的覺醒，和新「世」的發見，但這兩點都是他們探索古希臘文化而獲得的新啓示，可是五四時代的人，一面因爲時代的情感太不正常，他們對中國舊文化，只有反感，沒有同情，罵禮教殺人，向孔家店開火，以這種萬方不平的偏激感情，那能涵淵虛心地對中國文化有自我認識，雖然當時整理國故的呼聲，也曾甚囂塵上，但所做的都是些瑣碎考據的翻案文章，還是五四人物不能獲得深遠啓示的眞正原因。另一方面；也可說他們對「人」有所覺醒，對「世」有所發見，像婦女解放可算對「人」覺醒的一個例子，推崇賽先生的宇宙觀，可以說是一個對「世」的新發見，這雖是發見了過去中國人所遺忘的東西，和覺醒了過去中國人所不知道的世界，但這一切所覺醒的所發見的，祇在中國文化蛻變的過程中還有其特殊的意義，而在世界文化史上則並無新內容。本來文藝復興之所以爲文藝復興，原不在它接受古希臘文化的成果，乃在它從希臘文化中獲得以前所未有的覺醒和發見，這種覺醒和發見不是古希臘的，而眞正是文藝復興的特殊成就，但我們若淸算「五四」的成績，除了接受文藝復興以來這一脈思想和制度把它移殖到中國外，我們看不出「五四」有什麽新成就，他們對「人」的覺醒，是文藝復興以來對人類已有的覺醒，他們對「世」的發見，是文藝復興以來對世界已有的發見。這些「五四」所有的覺醒和發見，都是舊的而不是新的，都是已有的而不是新發見的。它不能叫做中國文藝復興，放大來說至多祇是西洋文藝復興浪潮在東方的尾閭延長。

「五四」旣不能稱爲文藝復興，在時代的需要上，我們自有權利期待一東方文藝復興在中國的到來。

總之，今天世界在大戰之後，一個陌生而恐怖的局面，已出現目前，人類自我覺醒之需要，已達史未前有的嚴重程度；中國在百年變局之餘，一幅落葉翻飛的文化景象，更需要有一「會極」「攝元」（會萬殊之極，攝衆類之元）的文化總綱——「人」與「世」，來貫串一切，陶鎔一切，融合中西思想的矛盾，泯除新舊制度的脫節，造成一東方的文藝復興，再建中國文化的殿堂。

從時代之塔瞭望過去，動亂的時代正是文化創造的時代，西洋文藝復興時的政治社會面目，也並不好看，生處今日，我們祇有發務開闢世界，却無理由對時代悲觀。這未來萬方期待的新「人」和新「世」，若以一個預言家的眼光看來，它的輪廓也赫赫在目，至少的，至少，「人」的自我新認識，已不是一低級的物質個體，有理知而無感情，有衝動而無靈性；新世界的系統，也不是一簡單的機械結構，有發洩物慾的地方，而無寄寓生命的境地。這新「人」不但有征服自然的能力，而且有駕御知識濟利社會的智慧，這新「世」不但可以各取其需之所急，而且有生命托庇之處，及精神自我慰藉之所。不過是否能有此覺醒和發現，就要看我們這一代人有無偉大智慧和根本覺悟了！

今日人類的悲劇命運並非不可轉移，由歷史的考驗上，人類的生命力，往往在山窮水盡之時，能衝決障礙，而達到另一柳暗花明的境地，同時，一時代險關的渡過，也正惟其不易，所以意義深遠，一時代新局的開拓，也正惟其困難，所以場面偉大。

「朝旣昬矣！雞旣鳴矣！」（詩，日出）在月落西山之後，自然是日出東方時代的到來，如我們能聚意力，瀉光熱，全盤反省，澈底覺悟，以一代的智慧，爲百代事而打算，則衆雄喔喔不難催天下之大白，也許東方文藝復興的到來，會使人類永遠懷記着：

「光明來自東方！」

定閱諸君：凡查詢或續定，務請註明定單號碼，以便從速照辦！

# 道德上有個毒刺

## ——美國人性格之七

費孝通

我曾經這樣想過：一個文化裏若是有一套東西特別看得重，重到不太受理性的檢討，重到時常要爲此動感情，這套東西必然是相當不容易得到的。反過來說很容易明白，我們生命所倚賴的沒有比空氣更重要了，但是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任何文化中有把這事實上十分重要的東西看得那樣重的；除非有一天我們整天得在重慶大隧道式的防空洞裏過日子，我們也許會發生一套特別看重空氣的信條出來。我已曾用這個原則來解釋爲什麼在饑餓的中國對於吃的一道會這樣考究和這樣的念念不忘。見了人第一句話：「吃過飯了麼？」見了朋友第一件事是約個飯局。不先喂飽了對手，似乎沒有話可以談得上的。一切聚會裏，不論是結婚或是死了人，總是吃一盤。逃生孩子的動機也在怕死後過年過節沒有子孫上祭，上祭也是吃。——這樣講究吃的文化却是一個大多數人吃不飽的民族。說來似乎矛盾，其實却是相配的。

從這個角度去看美國的講平等講競爭，就不免使人想起了他們黑白的界線來了。當然，話先得說回來，在數目上說，中國能大吃大嚼的祇佔極少數，一般生産者每年能暢吃一陣的也不過幾個節日；而美國能享受平等和競爭的，至少從理論上說，還是佔多數。——這說法也許不大正確，但是我們得承認被拒絕於平等競爭圈外的有色人種確是少數。我在這裏想說的是美國人這樣重視平等競爭多少是有着一大批得不到平等和競爭機會的「黑奴」做着背景。

我記得黃裳先生曾在他「關於美國兵」的小册子裏寫過一篇「黑美非美」。當美國人說起「我們美國人」時顯然並不包括那千萬的黑美。我在讀 Mead 女士那本 The American Character 時，（就是我寫這一路美國人性格的藍本）也很明白的覺得，她心目中並沒有這些黑美。譬如我在「在記錄與起碼之間流動着」一文中分析美國社會階層的性質時，也找不到黑美的地位。如果我們把黑美加入這幅素描中，在起碼的界線之下，大概不能不再加上一格不流動的，黑漆漆的底層。以黑白的關係來說，美國却可以和印度相提並論，用社會學上的名詞來說，是個 caste 的結構了。

關於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地位我相信讀者必然已知道一些。如果不大熟悉，不妨去看一本美國新聞處重印了分送的 Washington Carver 的傳記。這位 Carver 先生是一位科學界中的人傑。他是念農業的，他在理論上和實用上的貢獻極大。舉一件事作證：他因爲美國南部的土地太差，農民生活太苦；所以提倡種植花生。他不但在種植上努力推廣，而且發現了花生裏的營養素，和發明了種種以花生作原料的工業品。——這種綜合的研究是後來 T.V.A. 大計劃的基礎。他的貢獻於人類的幸福是够大了，但是不幸得很，他是黑人。他去參加學術演講時，甚至國會裏委員會請他去陳述意見時，他不能住在大旅館裏，祇能從後面的小門和鐵梯上進出；他不能坐臥車，有時他得靠兩條腿走路。他的朋友們很惋惜的嘆氣：「假如他不是黑人——」但是這惋惜是白不了這位偉大人物的皮膚，在「平等競爭」的美國社會，他走不上「美國的旅程」，在比賽的圈外。

每一個到過美國去的中國人沒有不能舉出他親眼看見美國社會裏種族不平等的實例，因爲我們皮膚的顏色也並不是白的。我記得有一次我在美國參加了一個討論種族問題的會，主席很客氣的要我說話。我覺得很難開口，後來我說了：「我沒有意見，因爲我是在一個並沒有這問題的文化中長大的。我對於印度的宗教，美國的種族，成爲討論的題目，甚至成爲生活上的問題，祇有好奇心而已。」

我在書本上自然讀到過許多分析這問題的文章。我在美國的短期旅行中也受到過感情上的刺激。如果我要爲這問題說話，自知難於客觀，因之也不會得要領的。我的興趣却是在這顯然和美國所特別重視的價值標準不

合的現實對於一般美國人性格上的影響。

黑白的雙重標準在我看來是美國人道德體系中的一個諷刺。如果美國人接受了希特勒的哲學，認爲世界本是個種族競爭的場合，他們可以找到人類歷史上有着無數被淘汰了的種族，上帝是用了「物競天擇」的原則，以生存和繁榮去報酬最優良的種族。他們正可以把黑種人的「失了上帝的恩寵」來維護自己白色皮膚的優越感和自尊心。——這樣的話，美國人的良心是可以洗得乾淨的。但是美國並不接受希特勒的哲學。相反的，在他們天經地義的人權宣言上，寫下了人是生來就平等的。要證明黑美不是人，自然不是件輕而易舉的事。

我們念社會學的人自然明白，道德是在圈子之內的。當我們對付圈子外的人，殺戮、欺騙、愚弄是道德的，受到獎勵的；至少也不是不道德，可以容忍的。在戰場上，雙重道德表現得完全無缺。美國如果根本不承認黑美是美，取消黑種人的公民資格，他們把這些「非我族類」的人物，圈在「自己人」之外，在道德系統上也可以做到一貫的程度。但是美國人並不這樣做。在他們立國之本的憲法上又明明寫下了，不得以種類限制公民的權利的字句。

這樣，美國人祇有兩個選擇了：一是忘記種族的界線，以維持道德上的完整；一是昧了良心，維持種族的偏見。他們的選擇是第二條路。

這選擇是有理由的。（我說有理由並不是說我是同情的。）在一個競爭的社會中，一方面是要競爭者大家不出軌，所以要講 fair play；又要大家在一條線上開步，所以要講機會平等。但是爲競爭而競爭，必須一個條件就是競爭者總得從競爭裏能得到報酬，報酬可以有多少之別，但不能白白的跑這一陣。所以歸根是要看大家可以得到的報酬的總數。如果總數不增加，而想分享的人太多，有人要分得不到時，競爭也就會變成亂搶了。人家說中國人坐公共汽車不守秩序，那是因爲汽車太少，守了秩序根本就會有不少人坐不上車。在粥少僧多時，不講進取的和尚們也會不講禮讓的。於是在競爭社會裏，在事實上會發生拒絕增加競爭者的傾向。我這樣說並不在體諒美國的種族偏見，而是在說明在現實界裏，競爭的社會可以排除競爭者的道理。

同樣的道理可以使我們這個重視吃的文化中，發生「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如果在糧食不足的國家，遵守了「推己及人」的道德原則時，大概事實上會沒有人能一生溫飽了。

美國維持偏見是事實，他們的代價是道德上不能完整，良心不安。當然，我很難想像一個人永遠在受良心磨折的。於是我們有孟子的「遠庖廚」的遮眼法了。這是說，我們承認理想是理想，現實是現實。孟子本是個不講邏輯的現實主義者，他一方面可以說性善，而一方面又要遠庖廚。一貫的推論，必須承認現實是不善的，這不善既是無可奈何，也必然是出於人的本性了。一個文化中如果發生了這種理想和現實的善惡之別，他必然要走到內向的路上，那就是說，一提起道德問題，心就虛了，想到了自己的不完全，而恐慌起來。「理直氣壯」祇在現實和道德相合的時候。理不直氣不壯的人是想逃避的，他們沒有勇氣認眞的就某一價值澈底的推論下去。美國人自己承認「年紀輕」，也就是自有的說法。他們可以高唱曰大自由，而不認眞的討論現有的政策是不是在遵守這項諾言。政治學家 Merrian 說，政治是 illogical moderation「難得糊塗」，也是美國理想和現實發生了太明顯的距離時的說法。

美國人心底是明白種族偏見和傳統道德標準無一合處。現實既難改變，於是祇有轉彎抹角的想法自贖罪愆。他們可以在藝術上儘量的接受黑人節奏，爵士的音樂和舞蹈是這樣進入了美國的生活。他們可以個別的向黑人捐些款子，做些社會工作。但是像一個犯了罪了教徒在牧師面前懺悔了，就可以心安而繼續發生犯罪的生活了。

這是那些想創立「美國世紀」的雄心家所遇到道德上的阻力。美國並不能站起來說：「我是民主的模範，民主是好的，因爲你瞧，我們的社會是多完美。」美國人是沒有說這句話的勇氣。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良心會輕輕向他一笑，「看看這不平等的現實。」「美國」本來不是個現實，而是個向某一理想的追求過程。美國人可以說，我們愛好民主，民主是好的。我們要實現好的民主。我們還沒有實現這理由。

民主是好的，能享受平等，能在平等機會中自由競爭。如果有人問：「你怎末知道是好的呢？」他們可以指出黑美的痛苦，「你瞧，黑種人得不到平等，所以苦。」他們的父母可以指着當差的黑僕教訓他們的孩子：「孩子，平等是可貴的。沒有了平等，就成了這種人。」在局外人可以批

許他們爲什麽不給黑種人平等呢？可是這是另一問題。孩子們聽這話所得到的敎訓是要保持自己的平等，並不是要把平等給人。

如果我們不能瞭解這個邏輯，不妨想想自己。當你看見在街頭乞食的叫化時，旁邊的父母和你說：「你不用功就會如此」時，你會想到的不是對叫化的同情，而對於自己地位的可貴和可能失去的警惕。

美國文化道德素質的脆弱是現在民主集團的損失。脆弱的原因當然很多，種族偏見和他們立國的基本道德的不相容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黑白階層之分可能是美國人感覺到平等競爭的重要的背景，但是這種等於caste的結構在本質上却不能容忍於民主自由的世界上，何况是想成爲民主示範區的美國呢？

這本是一個威望政治的時代。美國的種族偏見過去或者祇是一種引起美國人民良心不安的苦衷，現在都已成了舉世矚目的民主缺憾。顯然的，除非美國能另外選擇一條道路，就是維持道德的完整而放棄種族偏見，美國在威望上是不免要打了個很大的折扣。在我們的立場看去，很有理由問美國人，上一次大戰如果是在打倒希特勒主義，而不是在打倒希特勒個人，爲什麽美國人民可以容忍自己文化中相類於希特勒主義的成分呢？我們也更有理由懷疑：如果美國的民主中可以排除這樣多的黑奚於平等的圈子之外，別國的人民在接受美國民主的領導時是否也會造成這類於caste的結構呢？這些問題是美國想做新世紀的領導者時所必需答覆的。不然的話，美國儘管依恃他的財富，不能使人折服，威望並不能用金元來收買，也不是原子能的威脅所能爭取的；這是需要一種道德力量的。我們看到手無寸鐵而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可以支配大部的世界這樣久，就可以知道道德力量的偉大，而道德力量的發生不祇是說，而得實踐的。如果美國的民主在別人眼裏是個不貫澈的民主，甚至在很多名義上是公民而實際上被排除在平等圈外的美國人的眼中，美國民主也不過是個不講原則而講便宜處事的民主，試問「美國世紀」怎麽會在歷史上出現呢？一心一意想創立「美國世紀」的人，肯把金元浪費在別國的戰場上的，也該自省一番，還是在美國努力造成一個民主模範來得容易，而且成本也較輕。如果美國眞做到了平等自由的民主國家，世界上那一個人不願意奉爲模範呢？

我們當然並不應該因爲口口聲聲是自由之邦的美國自己有缺點而否定這些標準，可是爲美國想，實踐比了宣傳和出售都更切實些。

---

（上接二十二頁）大家也天天喊爭取言論自由，反對統制言論。大家也認爲爭的對象是政府，統制言論者是政府，絞殺自由者是政府。這些喊的人，似乎自己總應該守言論自由的義律，至少不要歪曲別人的言論。大家也反對「給別人戴帽子」的辦法，則自己至少總不要製造帽子來給別人戴，即使自己認爲那是一頂光榮的帽子，被戴的人却未必欣賞這種光榮而見你的情，因爲自由比光榮更可貴，被人戴帽子，無論出於善意惡意，都是不自由的。

我們也感到一種危機：中國實在不太可能有言論自由，因此也見不到有民主的前途。政府是否許可言論自由是另一問題，但即使政府許可，你也未必有自由，因爲你的言論尙未能到聽者的耳中，在半途已經被雜誌和報紙的編者，有意或無意的，善意或惡意的，歪曲了，改變了，誇大了，抹殺了！至少你的意見如果與編者不同，便沒有發表的自由。一個國家由一個黨政來統治固然不民主，但由十個道高來統治就會民主嗎？事實上黨政雖不多，而道高却眞不少。中國不許有「言論自由」的習慣，不但政府如此，而在爭言論自由的出版界也不免如此。至於干涉，歪曲，更改，譏栽抹殺別人的言論自由，則出版界如無自律的原則，很可能更甚於政府。這也並非「矢人不仁於函人」，而因爲一切言論文字如欲與讀者相見，必須先經過出版者之手，出版者與種種言論文字的接觸機會多。但這事對於中國民主的前途關係甚大。因爲出版界本身就是言論自由的保障者，有如憲兵警察是社會秩序的維持者。但如果憲兵警察自己也破壞秩序，這個社會非陷於無政府狀態不可。我希望出版界的朋友了解一點：當一個編者離開編者職位時，他的主張和別人的主張是平等的。但當他處在編者職位時，他操着別人言論的自由權，此時他若不能尊重別人的意見，別人的言論便不和他的處在平等地位，他是一個獨裁者，（雖然他也許是反對獨裁）別人的言論却往往是犧牲者。這個傾向如果很嚴重，則言論自由既不可能，民主政治更無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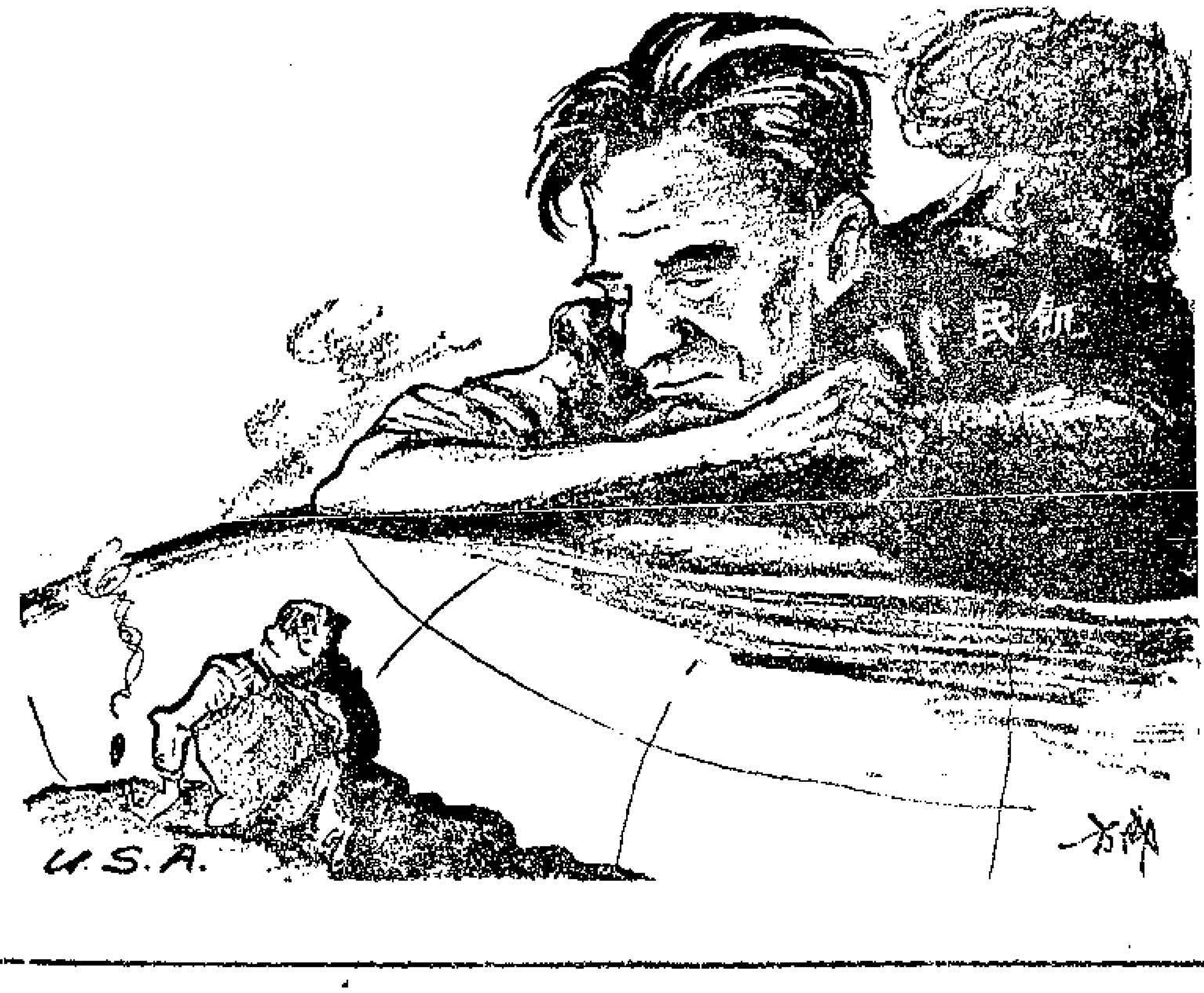
中國的政治民主要靠言論自由來建立，而言論自由則尙未誕生，只能說是在孕育之中。出版界是接生的醫師。一個良好的醫師，應該有一條自律的戒條，即：打胎是最不道德的行爲。

##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爲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實姓名的任何論文。

民災


U.S.A.

觀察通信版

# 北塔山事件發生後的迪化政情

本刊特約記者

## 張治中的苦悶

（觀察迪化通訊）

從中國與西域發生關係以來，張治中將軍是第一個抱着遠大襟懷從內地到西域的政治家。這遠大襟懷的可記述處並不在他爲國家保護領土，而是在他爲國家爭取人民。他憎惡過去新疆的統治者，並決不再走過去統治者所走的道路。他發現，在今天如果再用高壓或權術來統治新疆人民，不但不會得到任何效果，而且將永遠把新疆人民從中國體系中丟出去。領土去了，能夠光復，人民丟了，將不會再召回來。張氏常常讓人們自省自反，他常常讓不能忍耐一年來維族同胞的浮動的人們來反省：過去漢人是如何在壓迫地方民族，地方民族忍耐了幾百年，我們連一年都不能忍耐麼？他是想用至誠與耐心來洗刷千百年歷史的積垢，他認定這積垢如果洗不淨，即或暫時把新疆掌握住，終給國家留下一節盲腸。

一年來張氏懸着他的智慧與誠意，給新疆前途計劃下一條道路，這條道路是光明正大的。他不支援烏斯滿，他極力抑制不能控制感情的人，他力主中蘇親善，並實行中蘇親善，他給一切政治活動者以自由，……所有這些都說明了他不僅是開明的政治家，而且是扭轉歷史的人。但是在今天已不是一個人能左右事局的時代了，張氏的理想缺乏實際的配合條件，拖到今天，眼看着新疆又將跌進過去的泥淖裏了。北塔山事件之揭開，我們很懷疑，張氏會對之發生興味，而北塔山事件揭開以來的迪化動態將使他更苦悶，更感覺孤獨。

## 暗殺與鬥毆

把新疆交給新疆人來治理是張氏二年來經驗的收穫。但新疆人能不能治理新疆則要待事實來證明。新疆這塊只有四百萬人民的地方，不但民族複雜，就是一個民族之間也有各別的森嚴門戶，彼此從來不合作，互相排擠傾軋。揚增新曾利用這個來維持其十七年的統治，盛世才也利用這個來建立起其特務機構，惟有張治中將軍想化他們爲一家，他從來棄絕權術，但是他們積習難返。麥斯武德登台之後，排擠與傾軋之風更甚了。

說新疆的一切反政府行動都有外力作背景未免有失公道，許多事件都是自發的，就是去年的類敏事件，外力也決不作那樣愚蠢的事。

麥斯武德，離開新疆過久，在民間的力量不能說沒有，但總不太大。艾沙等人縱然掌握住若干人，但終未能控制住絕對的多數。而阿和買提江一系，基本上既別有抱負，同時由于一年來許多不能與張治中協調的政府工作人員之行動的刺激，使他們認爲麥斯武德的登台是政府對他們的進攻，乃更感到有加強他們政治攻勢的必要。

文化落後的民族總把暴力擺到第一位，總以爲一切是可以暴力征取的，于是在新疆政治鬥爭明朗化以來，鬥毆與暗殺的事件乃層出不窮，迪化南梁又如今春一樣，成了恐怖世界。舉幾個實例，六月十四日下午迪化保安司令部哈族軍官窩速清被維哈文新疆日報社職員葉列捷甫等人兇毆，傷勢沉重。七月一日（新省和平紀念日）夜維大會，維哈文新疆日報社職員和新疆三青團的職員（均係維哈族）在南梁互毆，當場死二人，傷十餘人，此外在六月下旬迪化南郊發現被殺的維族人屍身一具，面容被毀，無從辨認，最近數日，情況更加嚴重。

有人認爲這是好現象，因爲維漢之爭已轉爲維族自己之爭，這種愚蠢的見地，不知根據什麼想出來的。

現在阿和買提江一系與擁護麥斯武德的人們手裏幾乎都有槍，他們相互間的仇恨之發展，將把張治中苦心孤詣爭取來的和平毀滅了，幸災樂禍的人，恐怕也得不到什麼好處呀。

## 省參議會流產

新疆省參議會在五月二十八日與麥斯武德主席就職典禮同時舉行開幕式。當日張治中致詞中所云：「有了民意機構以後，和平建設便可以實現。就是說，從今天起，議場代替了戰場，口筆代替了槍炮。」但是從這一天之後，參議會始終沒有再開。伊犂那一方面與反伊犂那一方面都想在議會中控制絕對多數，可惜的是事局迫急，他們已放棄了思想爭取，而以他種方式互鬥。據六月二十二日新疆日報發表，會議發生障礙的原因：（一）伊區應選十四人，但報到者竟達十八人，且多爲現任官吏及軍官醫官，與選舉辦法不合。（二）塔區應選七人，但報到者八人，而此八人中與原選姓名不符者五人，並缺蒙族議員。（三）喀什區應選二十人，但報到者二十二人，而此二十二人中與原選姓名不符者七人，（四）回、錫，索，滿參議員已由回族文化促進總會，錫索滿文化促進總會選出，但此次伊區來迪之省參議員帶來回、錫、索、滿族各一人，要求參加會議，以代替各該文化總會依法選出的省參議員。這些問題後來由省府指派阿和買提江副主席召集七人小組會議來解決。小組會自五月廿八日起開會數次，決定處理辦法，但伊、塔、喀三區省參議員，不肯接受。七人小組會議在

六月又數度開會討論，仍無結果。實際上這裏所謂資格之爭不過是表面的，省參議員已顯然地分成兩個營壘，卽伊、塔、喀三區省參議員是反政府派，而其餘各區的參議員中之大部則是擁護政府，大家都想在議會中掌握多數，因此以資格問題來互擊。六月二十五日迪、哈、阿（克蘇）、莎、焉、和及少數民族參議員等五十八人在新疆日報上發表宣言，聲稱伊、塔、喀三區省參議員破壞了省參議會，而伊、塔、喀三區省參議員三十二名也在維文新疆日報上發表宣言，聲稱破壞者是迪、哈：等區參議員，而不是他們自己。

七人小組最後委曲求全，想把資格問題擱開，儘先開會，但恐議會鬥爭劇烈，特限制提案範圍，卽（一）省參議員無背叛國家之自由，（二）提案不得脫出和平條款與施政綱領，卽不得提出反對中央與新省現在關係的提案，要求國軍撤退的提案，及對中央改組省政府命令的提案。但伊方參議員對不得提出反對中央改組省政府命令的提案，不願接受。最近張治中以調人資格來調處各項爭端，前後經十六小時的協商，仍無結果，省參議會恐不免流產以終。

從這裏我們知道，在新疆的政治鬥爭，大家雖已把暴力擺在第一位，但他們對于議會鬥爭依然看得很重，不然不會發生這樣的爭執。這也可以說明如果在政治我們有辦法，和平的維持還不是不可能的。

## 再來一次展望

記者在六月十二日的通信中曾提到：「我們相信（北塔山）戰局不會擴大，：．不過由此一事，新疆的局面將因人心之不安而更難統治了。」北塔山事件在新疆的官方報紙上並沒有什麼宣傳，但是反對伊方的人組成了各民族擁護和平統一聯合會，連續向行轅、省府、警備總部請願並上意見書，並把烏斯滿（這個封建民族英雄）當成了偶像，集金來慰問他。這些人被北塔山事件所震懾，担心新疆的危難已迫于眉睫。在伊犂那方面爲北塔山事件所刺激，也担心政府將有不利于他們的行動，也在積極準備。而實際這都是杞人憂天，外蒙在目前決不會以武力越過北塔山，另方面在張治中在西北的一天，也不會使新疆當局有不利于伊方的行動。但感情之火將燒盡理智的今天，誰又肯把事件仔細研究呢！

在今天大家都太苦悶了，便幻想到世界戰爭，但世界戰爭去今天尙遠，美國人不但爲了他們的國家安全，就是各政黨爲了卽將到來的大選，誰也不會發動戰爭，至于蘇聯，正在拚命恢復國家元氣，不但不願發動戰爭，反之却在極力避免戰爭。而且戰爭並不能解決問題，如果它能解決問題，今天的世界也許早就平安了。

張治中明白這一點，所以他極力維持中蘇，至少是新蘇親善關係，並力謀以經濟文化救助邊民，可惜的是許多人被目前的現象所激動，不能協助他向前走。

如果大家迷信利用新疆民族間的矛盾，或一民族間的矛盾來挽救新疆的危難，而重蹈歷史的覆轍，使後人徒哀後人，則貽害于國家民族眞難以計算了。

張治中此次回新疆後，曾告誡部屬說：「我們決不能自欺欺人，只要我們眞誠去做，不愁沒有好結果。」並仍以寬闊的度量，最大的忍耐，遠大的眼光，樂觀的態度往前引導人，勉勵人，始終站在爲國家爭取人民的立場上，這可以說在中國其他地方決不易覓到的政治風度。他發現他的政策之未表現出成效是由于作得不夠與不切實，而決不懷疑他的政策，這是值得我們欣佩的。新疆前途便繫于他的政策之不被丟棄，和他的政策之作得夠，作得切實了。

七月三日

# 四平解圍之日專機視察報告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瀋陽通信）

六月三十日上午九時，由鐵嶺、昌圖北上的國軍與四平守軍會師，結束了四平的攻守戰，同時也結束了東北共軍第五次的南犯，二十天以來，共軍日夜瘋狂的猛攻，國軍也堅强的抵抗，全城終被毀於砲火與炸彈之下，這次是東北空前所未有的大戰，可是這大戰的意義與代價是什麼？我相信將來歷史家會有更正確的估價。

於會師當天的下午五時，記者隨行轅熊式輝主任，長官部趙家驤參謀長，空軍王叔明副總司令，前往四平，由王氏親自駕駛。這草綠色C46大飛機平穩地延着中長路西側向北直航。當時氣候甚佳，蔚藍天空，只飄幾朶白雲，俯視大地，田園交錯，瀋市外圍的城防工事，歷歷在目，美麗的河山，處處夾雜着戰爭的情景。過了遼河以後，氣候突變，濃雲飛繞機翼，震動甚烈。眺望遠處，正在下雨，如輕紗下垂，非常柔美。過昌圖時，氣候轉佳，并已能看到地下的戰蹟。鐵路橋樑已無完整，沿途村鎭房屋均殘破不堪。美麗的山河，處處雜着戰爭的情景，我不禁感到八年的抗戰，犧牲了多大的代價，爭回了完整的土地，可是人民并沒有安居樂業，北方更到處是戰火；東北是多麼好的一塊土地，不但是北方穀倉，更是中國工業的基石，但東北正在毀滅之中，令人感慨萬端。

在敵僞時期，四平是南滿食糧的集散地，所以四平已具近代化的雛型。飛機到四平上空時，低飛繞全市一週。

鐵路西部房屋大部頹垣斷壁，鐵路東部尙有大部仍在燃燒中。但望濃煙、烈火

、廢墟、歷歷在目。地面上煙霧迷漫，直升如雲。降落後，四平守將陳明仁及遼北省主席劉翰東氏，均在機場迎候。陳氏滿面鬍鬚，顯得更枯瘦了。劉氏臉色蒼白，胖臉也削瘦了許多，充分表現了飽經戰塵。機場的建築物，都毀光了。在這次戰役中，機場曾斷殺數次，被共軍佔有十多天。當天晨三時，共軍始撤退，跑道剛剛清除修補完工。跑道上還殘留午前的雨水，地面濕漉漉的。空氣經雨洗之後，清爽宜人。遙聞這處一兩聲槍響，劃破了靜靜的氣氛，使我想到幾小時以前，這裏還是一片殺場！

下機後，大家分乘五部吉普車駛向鐵西區。車內都是泥土與殘餘子彈。由機場駛向鐵西區的道旁，田地裏五寸多長的禾苗，尖端都枯黃了。附近長滿雜草，大地上找不到一個農夫，充滿了戰場上一片淒涼景象。沿途又都是久經砲火的碉堡，殘缺的立着，據說裏面有大批死屍。有些是鋼骨水泥的工事，均被擊毀。口徑五寸粗的鋼管，都亂攤在地上。電線桿子東倒西歪，電線一條條的垂到地面，隨處都是炸彈大坑。路旁有死屍堆，焦黑的體形，傳着一陣腐臭，氣味撲鼻，使人們的呼吸都閉塞了。路當中死了的戰馬，已生了白毛，被蒼蠅閧着，卡車過時，都四散飛開。這處又傳來少數槍聲，車上衛士驕傲地說：「這是我們的弟兄放的」。看這些士兵的眼睛內眼球佈滿了紅絲，烏黑的臉塗滿了泥土；那蒼黃疲倦的面孔，那穿着破爛骯髒的服裝，這眞實而殘酷的戰場，這遠離家鄉的人們，我除了能向他們表同情以外　還能給他們什麼呢？他們說：「我們抓住了不少日、韓人，這些傢伙都是砲手，放的眞準啊！」是的，這次戰役中雜有外族人，同時槍砲子彈也都不是國貨。我深感到這戰爭不簡單，我不敢再想將來的東北。人類總是在互欺互殺中求生活，爲什麼不能親愛的合作呢？至少在一個國家內還不能合作嗎？看這集體自殺，這殘酷的情景，我不僅想到戰爭的收穫是什麼！代價是什麼！戰爭除了埋下再戰爭的種子以外，戰爭能解決問題嗎？

路過遼北省教育廳，門額上的遼字沒有了，建設廳的牌子歪扭地立着。建築物薰滿黑煙，門窗、房頂已不知飛向那裏去了。鐵西區地方訓練團，爲國軍堅守的據點，以大豆袋而代碉堡，幷堆滿桌椅板凳。衛兵指着說：「這裏始終沒有被八路打進來」。在大橋附近，堆積着大批的米糧與大豆，還熊熊的燃燒幷冒着濃煙。車站．票房已無蹤影，路上還拖着許多大桶黃色炸藥，滿裏還堆着子彈手榴彈與屍體。鐵軌上還有幾列破車皮，散漫的停着，也有躺着的，沿途一幢幢紅的洋房，都是頹牆斷壁，只是一大堆瓦礫，棹椅用鐵絲絞着，上面堆着大豆袋，街上也散滿了大豆。漸漸的有行人了，大都是士兵，坦着胸，一步步拖着脚步走，間或看看這一行卡車。不會驚訝不會笑的臉，經過長期堅苦戰場的人，不但人生觀改變，連面孔也不會表情了。炮火不但能毀滅生命，也能毀滅人性的。

公園廣場週圍的高大建築物，全部毀於砲火，只剩了燒黑的四壁。一片瓦礫場，看不見一個行人，像死一般的沉靜。除了吉普的引擎聲外，再也找不出什麼動靜，除了廣場核心的一些綠草，再也找不出有生氣的東西了。壯麗的中央銀行大廈，整個燒毀，在殘留的洋灰圓柱上，烙着黑煙。台階上躺着一個死屍，作向上奔跑之狀。交通銀行，中國銀行也只剩了四框。沿途的牆壁上，彈痕纍纍。唯一的大衆日報社，只賸下藍地紅字的一個門額。在拐角的一片瓦礫場中：站着一個中年婦人，油黑的臉，披散着頭髮，向四外看，像是找尋甚麼遺失的東西。我想這片瓦礫也許是她溫暖的家罷！在另外一個毀滅了的房屋中，聚集一些人，那窮憔枯瘦的臉，張着嘴對我們這些不速之客呆望着。光着身子的孩子們站在破房門口，這些景象是不易使人忘却的。這些百姓犯了什麼罪惡，受着死亡的災難，這次戰役的意義是什麼？爲什麼？四平老百姓有多少人知道呢？可是他們直接身受這戰爭的痛苦，是誰之賜予？四平向鄭家屯的大鐵橋（百五十公尺長）也毀了，衛兵咒罵着說：「媽的，這鐵橋毀的多慘多可惜！」同樣的，四平毀的多慘多可惜。在瓦礫堆中，重建一個都市，是不容易的。在一片焦土，一片廢墟中，而最嚴重的問題是人們無屋可住，無業可謀，飢餓和溫疫的盛行。

這一場空前的浩劫　四平已成一片死寂的焦土。四平本身是沒有力量再起來了，這個重建的責任，不單負在東北人的肩頭上，更是全國人的責任。可是我總在想：爲什麼要破壞？爲什麼要自取滅之呢？

歸途中，在薄霧夕陽下的美麗大地，多映入眼簾：這大自然的美，與戰場上人爲的醜，使我再也分不開了。我不知道，上帝爲什麼，總把美與醜作強烈的對比呢？這情景接連的騷擾着我，使我做了兩天可怕的惡夢。

七月四日　瀋陽

# 編後記

一、我們特別向讀者推荐本期所刊楊光時等十位先生投來的這篇「我們對于大局的看法與對策」。據楊先生附函：這篇文章是他們十位經過一個月的討論而寫成的。我們認爲這篇文字所具有的若干觀點，無論在國內國外，都沒有人提過。我們希望這篇文章能引起各方面廣泛的注意。

二、本期前面四篇都是外來投稿。我們對于稿件取捨，向無成見。祇要文章好，我們一律採用，並給以應有的地位。

三、當本期出版時，編者已在北平。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期由吳世昌先生代編。各方惠稿投書，仍請逕寄本社編輯部。寄給編者個人的函件，則須俟編者八月中旬返滬後，始能一一奉覆。（編者）

# 湖南省參議會旁聽記

本刊特約記者

（觀察長沙通信）湖南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三次大會，自六月十六日起，到廿九日止，整整開了兩週，除了端午那天，大家以審查會議爲名，休息一日外，七十幾位參議員，足足忙了十三天。記者也就在民主議場旁聽了十三天；這里很客觀的忠實的將我所看到的作一個綜合報導。

## 一筆賬

這次會期十四天，連會前會後的日子，列報的經費是五億元。再加私人應酬，各種招待，將達六億元。這六萬萬元，直接間接，都出自人民身上，也就是說，三千萬湖南人民每人給自己的代表用去了二十元，而每個代表是否給每個人民謀了二十元的利益，這還是一個問題。七十幾位代表領旅費、出席費、交通費、膳宿費的時候，只有一個張本清說了一句：「老百姓又給我們剝削了一次。」閉幕後王東原主席又特別未公開的每人送給了所謂「駐省用費」五十萬元。除了彭紹香一人三次拒收外，其餘都悄悄收下。

## 火併

議會本是民主的產物。談到民主，當然不能沒有黨派的競爭。可是歐美民主國家的黨派競爭祇是政見的不同，主張各別，其大原則還是爲國家爲民族。而在中國，則常常是在同一個主義，同一個領袖之下的黨團派系之爭。這種黨團派系之爭，在平時已鬥爭得很利害，此次在湖南省參議會中，則表現得更外激烈。

記者曾在會場上，發現一條歷紙，上面寫着全體參議員的名單。一組是在姓頭上打○，一組是打×，一組是沒有記號。嗣經記者根據會議發言情形推敲，才了解這一個饒有趣味的祕密，打○的是周天賢領導二十八個青年團集團，打×的是彭紹香所指使的三十一個國民黨集團，沒有記號的十六人是第三者。理解了這個關係，才能澈底瞭解每個人發言的用意。所以在大會中有兩場施政質詢，其激烈打破了以前的紀錄。第一場是對李樹森（閣）的保警質詢，整整攻擊了兩點鐘。連李樹森自己也聲明，他有生以來還沒受到過這樣的大砲。第二場是質問劉修如（黨）的社會工作，連車站服務生不敬禮也都成爲質問的題目。許多參議員自己也不諱言，還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以攻擊還攻擊，以大砲還大砲。

## 大會印象

記者對於大會的總印象是簽到、發牢騷、赴宴、領錢。在大會發言熱烈的，除了一小部份有正義感的眞是仗義執言以外，大多數是有怨報怨，有仇報仇。無怨無仇的，就發發牢騷。連牢騷也沒有發的，便只有伏案打鼾，大做其清夢。其中可以提出的，記者認爲黃德安，林式增，總算是在眞正開會。他倆用心在聽，用腦在想，有常識，有主張，大多數的地方，沒有夾雜私見；對每一質詢，每一議案，都不願意放鬆。有許多案子糊里糊塗通過了，他們常常說：「這是不能通過的，爲什麼通過了？」還有龔勵初戴昭明，他倆沒有忘記本身是人民代表的立場。蕭達蔚不願同流合污，他不但不參加競選，而且看不慣一般人的勾心鬥角，他是唯一的放棄投票權的一個。

## 賭咒與放炮

質詢時的沒有風度，是有很多的例子可舉的。即如陳士說：「本人參加三次大會，從不說話，這次發言，定要說個痛快！」——以前是誰阻止他不說話的呢？這次又有誰在阻止他說得不痛快呢？其次是動不動首先賭個咒，民政廳長賭咒，田糧處長，警保處長：：都賭咒。當質詢時，滿口謾罵：意在說個痛快，說完以後，下文呢？不必管了。公路局長程烱當面開交：「諸公放砲，要找到目標，如果徒放空炮，則對方不過欣賞炮聲而已。」這幾句話，也可以說是：「無的放炮者，人亦放其炮」。

## 人情私利

會場上還有一個現象，便是「人情重於一切，私利重於一切」，連看不慣這些現象的參議員，自己也曾沉痛地批評過。就如陳經章說：「以前人家罵豬仔議員，豬仔議員還可以賣幾個錢，我們連豬仔議員都不如。」這是何等痛心的自供？再舉出事實來的話，開會期間，省級各機關便紛紛接到介紹信了。靖縣參議員唐振之介紹自己的弟弟，去作縣田糧處長，未得圓滿結果時，在省田糧處辦公室拍桌打椅。默契以後，在省田糧的質詢質目中，便一聲不響的去討好。頭幾次會，要救濟分署出席報告，討論時至爲激烈，以後便緩和，最後經過大會祕書長費伯閣的疏通，斡旋、拉攏，在會中始終沒有作「要救濟署出報告」的硬性決定。頭次預備會議，提議謝絕一切宴會，但等到廿八日風潮一過，大家坐了救濟分署的吉普車，互相拉拉手，斟上一杯「香檳」。

## 選舉

大會最重要的節目，是最後一次的選舉。選舉九個駐會委員，五個省營事業監察人，和兩個經濟考察團團員。在投票、開票、唱票、記票：：以至宣佈結果，那些原形畢露的狀態，眞使旁觀者爲之失笑。當時間快要到選舉之前，大家再也熬不住了，把五十多個關於請願、檢舉、建議：：的案子，統統改交駐委會辦理。在進行選舉時，競選者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陳士以六十票當選駐會委員，趙議長首先同他拉手道賀，「恭喜！恭喜！」陳參議員恭敬地說：「議長，這次承你的提攜！感激！感激！」

（七月二日寄）

週末闢欄

# 言論自由的自律

吳世昌

去年冬天，校中一位同事陪一新客見訪。經介紹後，知是人物雜誌社的一位負責人，不言而喻，是來約稿的。我那時正很忙，以爲約稿是常事，而我又不會寫人物雜誌一類稿子，只好請暫緩。但這位先生十分誠懇，熱心，時常來訪，也很談得來，終以他的誠意可感，經數次催促後，熬了一夜，替他寫了一篇『記一個教育者』。我相信那一篇稿子是值得寫的。但該雜誌二卷四期刊出此文時却改成了一個黃色的標題『記創制「麻將教學法」的何章欽』。事前並未徵我同意，亦未通知我，直到刊出才知道變了。這樣輕薄的一個標題，完全出我意外。何先生是我中學時代的老師，此題竟直呼其名，既失體統，又陷我於無禮。其實我寫此文的態度是嚴肅的，而其中說到何先生用「數學牌」來訓練學生背科學定理，只佔全文三分之一。人物雜誌這樣做，當然並無惡意，只是爲了它本身的生意經，上海人所謂「噱頭」。但一個編者把作者及其老師作爲「噱頭」的材料，我覺得很不公平，而且對於大家正在爭取的言論自由的前途，大有妨害。

一個編者改一篇文字的題目是可以的，我自己也編過期刊，改過別人的題目。我的文字在若干期刊上發表，題目也被編者改過。但我想普通在兩種情形之下可以改題目，其一，事先商得作者同意，則一切自無問題。其二、如來不及或無法商得作者同意，而編者認爲有更改的必要，則也只能向嚴肅正經方面改，不能向輕薄方面改。文章的題目總得與內容旨趣相稱，不是電影廣告，漫畫卡通，可以把局部誇大，或排些「噱頭」字眼來吸引觀衆。我那個題目其實倘無更改的必要。我爲此事曾函請人物雜誌社更正，人物雜誌的編者從善如流，給我更正了。但這類事總以不發生爲妙。

這類事情，小而至於個人瑣事，大而至於社會問題，國家大事，我們如果平日留心，隨時可以碰到，看似無關。有時却也頗重要。

×　×　×　×

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是例假，我照例要睡一個早覺。但在八點鐘被我的厨子叫醒。我埋怨他不該叫我，他說那位客人早上七點鐘已來過一次，經他回了，現在又來，才來叫我。我只好起床，那位客人是前幾天來過，約我在這天到西山碧雲寺北平各界公祭總理的紀念會中講演的。我原已謝絕，但他終於一早就來，顯然是怕我出門。我說，公祭總理，（那時政府尚未公布用「國父」名稱），我理當去行禮致敬，但不會講演，並且請他先去，我自己會到西單牌樓坐公共汽車去的。但他一定要爲我備車，且陪我去。到了碧雲寺，紀念會已在進行，有人在演講。主席見我到了，立刻停止那人的演講，要我去講。我說，『既是公祭，我先行三鞠躬禮』。於是主席就向大衆介紹說：『吳先生對於總理的「容共」「聯俄」「農工」三大政策十分欽佩，所以他要行三鞠躬禮』。這位主席是我素未認識的。我知道他這話的用意和重量。我知道他一定很自負這句話說得聰明，使我無法回駁或分辨。但我相信他也並無惡意。不過這三大政策既是總理的，我當然也不好向大衆聲明不欽佩。更不能因爲三鞠躬不必是因爲欽佩三大政策而取銷，不鞠躬了。我一面鞠躬，一面心裏奇怪：何以一個鞠躬代表欽佩一大政策？如果總理有四大政策或十大政綱，是不是要行四鞠躬或十鞠躬？如果我只行一鞠躬，則我欽佩的是三大政策中的那一策呢？沒有等我想完，已有人把我弄上了主席台，原先那位演講者則從此堅持不再講，其形勢是非要我講不可。

第二天，北平世界日報記載此會說：『自由講演者有燕大教授吳世昌等……』這位外勤記者如此記載，我相信也並無惡意，只是弄錯罷了。但不知道的人也許會覺得我太無聊，既冒充燕大教授，又跑去自由演講。我立即送一更正信與世界日報，說明兩點：一、我在北平研究院工作，並非燕大教授。二、演講是該會籌備會事先派人來接洽，臨時又陪去的。但此函並無發表的自由。一直到我自己跑到世界日報廣告部去作爲啓事登，該報才勸我不要登啓事，允將更正函刊出。

這也只是一件個人的瑣事，但我想，與言論自由却很有關係。

×　×　×　×

自從美國的Reader's Digest傳入中國以後，替中國的出版界添了一條不化稿費而能出版期刊的辦法。在交通不便，書價高漲，以及讀者耳目未周的情況之下，這種工作確有貢獻。能使重要文章廣爲流傳，在文化的意義上原也有價值。但轉載或摘錄文章，在外國須經作者或版權人的許可。在今日中國的局勢之下，則「國難期間，一切從簡」，也未始不可原諒。轉載或摘錄文章，自須經編者的判斷選擇。正如詩文選集，選家必有旨趣標準。重要的標準，甚至可以樹立風氣，蔚成學派，例如蕭統選文，以「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爲宗旨，其未入選者徐陵編入玉臺新詠，二者均能自成體例，開拓風氣。但必須其所選可以代表作者，才有價值，否則讀者上了買櫝還珠的當，作者有捨長取短之恨。如果是匡時談政之文，尤其在目前的情況之下，一個編者若有偏見，則同一文章，可以摘成極左，也可以摘成極右，可以刪節得上氣不接下氣，失去了邏輯聯繫，也可以摘得不黑不白，變成鄉愿作品。在編者當然認爲摘此文章，是瞧得起它，而作者則有焚琴煮鶴，哭笑不得之苦，甚至可能影響到他的名譽和基本自由。同時也等於強迫讀者斷章取義。這種情形，有時是編者的觀點和識力問題，但也可能是一個道德問題，所以如果因篇幅不夠，必須刪節，必須極端審慎客觀，否則寧可轉載全文。

×　×　×　×

讀者也許覺得我舉的事太瑣碎，我却認爲這是當前一個極重要的問題。現在大家天天喊民主，民主政治的基本條件是言論自由。（下接第十六頁）

# 談伍光建先生的翻譯

戴鎦齡

談起翻譯，誰都不能不對已故的伍光建先生肅然起敬。作者對伍先生的道德文章亦素所景仰，故本文所論列，乃本春秋責備賢者之旨。學術界正是顯著這樣的現象：許多自吹自擂的人們天天掛羊頭，賣狗肉，那些受欺騙的門外漢和青年人也天天忙於盲目地捧場附和。像伍先生這樣勤勤實實的苦幹者，而且不說大話欺騙門外漢和青年人，是多麼地難能可貴啊！

伍先生在翻譯界的貢獻，衆所共見，我們這裏可以略而不提，毋寧提出他的翻譯的可以商討之處。

伍先生譯書很早，但成名還是在他的大仲馬「俠隱記」經過胡適先生揄揚之後。胡先生的揄揚，固然有他的觀點，而且是批評界的一段佳話。不過我們從另一觀點覺得大仲馬不是法國第一流的小說家，「俠隱記」也談不上是第一流的作品。伍先生似乎根據英文本重譯，這辦法也不無可議之處。伍先生晚年爲商務編譯的次流作品甚多，專供中學生自修英文之用。這工作何須勞動伍先生的大手筆，眞是精力的浪費。假使我們過去儘量翻譯第一流的名著，而且非至萬不得已不依據重譯本（頂多把它當爲參考），也許翻譯界早有了更大的收穫。

「多文爲富」，可以用於伍先生而無愧。伍先生的翻譯雖大都限於文學，也包括哲學(例如 Leibnitz)，並且涉及歷史（例如吉朋的「羅馬衰亡史」Gibbon's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在數量上很有可觀。問題也就在這裏：一個人眞正懂得的東西究竟有多少？翻譯不但是精通文字的問題，而且對於所翻譯的書的內容，須有透闢的了解。譯的書太多太雜，便使人疑心譯者未必樣樣是內行，至少有一部分譯書是爲應了書店老闆的催請而草草完成的。「羅馬衰亡史」的伍譯，前聽說過，並未親見過。這部書值得譯否很成問題。就考證史實說，吉朋的歷史早已過了時。自從吉朋以來，關於羅馬史的新發見新解釋，正是材料浩瀚如海，我們有比吉朋更正確的羅馬史。在英國文學史裏，「羅馬衰亡史」佔據着光榮的一頁，不是因爲這是一部標準羅馬帝國後期史，而是因爲這書的文章風格的優美有劃時代的重要性，可以說後無來者。原文語句的沛暢，韻致的跌宕，用字的精鍊，諷刺的深入，氣魄的磅礴，幾乎上追希臘拉丁作者。翻譯大仲馬成功的文筆是否能翻譯吉朋，頗成疑問。吉朋自己下筆時尙覺得英語不夠典麗高皋，不得不時時採用拉丁語句以資潤飾補救。中譯本如要保存原文風格之美誠是難之又難。照我們所知，伍先生文筆以通俗平易見長，和吉朋正是格格不相入的。其實這類富有詩意的散文，如同詩歌本身一樣不適宜於譯成別種文字。「唯詩人能譯詩」。那即是說，譯成的不一定是代表原文，翻譯本身便是創造。

儘管翻譯界有種種理論，我個人始終相信，忠實於原文乃是首要的條件。就這點看，伍先生殊不能太令人滿意。在許多伍先生譯的書中可以哥德斯密（Goldsmith）的「威克斐牧師傳」（"The Vicar of Wakefield"）爲例。這部世界名著，中文據說有三種譯本，自然以伍譯爲第一。不幸伍譯也犯了些可以避免的誤譯。原書民國十八年出版，始終未見修改，亦可見吾國出版界保守性之重與不事改進。

伍譯的錯誤，我們不必有心去找，可以說一打開就看到。序文上 "husbandman" 指「農夫」，伍先生譯爲丈夫之「夫」，顯然望文生義，把它和 "husband" 混爲一字。

第一章第一段 "notable woman" 伍譯「與平常女人不同」。按 "notable" 固有「與衆不同」之意，此處乃指「曉事的幹練的，勤快的」，正是與衆相同處，因爲這字所指正是一切主婦所應共同具備的。Chambers 二十世紀字典解此字爲 "capable, clever, industrious"，是也。簡明牛津字典注爲「此字用於女人時，第一音節讀短音，指幹練的勤快的，像管家婦的」，尤妙。許多英文字除普通意義外，還有特殊意義，即不查字典，大概可從上下文看出。伍先生似乎略過此點。

第一章第一段 "She could read any English book without much spelling" 末尾的 "without much spelling" 乃一 adverbial phrase，形容 "could read"。伍譯「英文書拚音不太過當的，他也還能讀」，殊無根據（「太過當」也不是很漂亮的修辭）。寫到這裏，順手翻到同章末段，"the learned professions" 乃指有專學的職業（律士、醫生、牧師之職業），伍譯爲「文藝」，不免以意爲之。

有時伍先生不以意爲之，他便索性說明不知出處，我覺得這態度倒是對的。雖然他所認爲不知出處的地方，往往不難索得解人。例如第二十章 "tattering a kip"，伍註不敢強解，英國坊刻本有刪去此句者，豈以其不可解歟。按 "kip" 指「妓院」，稍全備的英文字典皆載此義。"tattering" 原有「撕毀」意，此處借作「搗毀」。「搗毀妓院」乃十八世紀倫敦惡少慣行的惡作劇，並無如伍先生所謂「不可解」之處。原書以文筆優美，久被英國中學校採爲通行讀物之一，課本編輯人恐此等語句有礙兒童純潔心靈，故將其刪去，並非以其不可解也。

我們最覺得奇怪的是：伍先生譯文任意刪節，一句的，整段的，割棄甚多，原文大都不難解釋。這樣的刪節，無論是有心抑係無意，實非譯書應有的態度。

「威克斐牧師傳」爲世界名著之一，若干年前也曾經被我國學校採爲課本，而譯文不滿人意如此。可見通行的英語文藝作品，儘管教的教，學的學，教學雙方的了解是否徹底頗成問題。從翻譯界的立場說，一部名著不妨多來幾種譯本，經過種種嘗試和比較，也許可以獲得進步，漸漸有差強人意的譯本。

中宣部寧（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二號

# 閱讀報紙雜誌所必備・研究國際局勢的工具

## 1947 世界政治手冊

陳原編

這本手冊，是我國第一本觀點正確，材料詳實的世界年鑑。即與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每年刊行的『世界政治手冊』來比較，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全書三十萬言，以國家分篇，又聯合國一篇，次序按西文字母排列，各篇內容，分述（1）政治局勢（着重戰爭中及戰後的局勢），（2）政府組織（政府、議會的選舉，目前議會及內閣中各種勢力的分析），（3）政黨，（4）日報，（5）經濟概況（包括資源、物產等的數字，尤重戰爭中及戰後的經濟情勢）。

各篇之首，列有最新統計的各該國面積、人口數字，及首都，元首等。

書末附錄『國際常識小辭典』，解釋簡明，翻檢甚便。

這樣的一本手冊，我們相信對於閱讀報紙雜誌，研究國際局勢，會有很大的幫助。現已出版。

・每部定價國幣拾圓・

特價優待券

憑券購此世界政治手冊一部八折優待

# 生活書店

上海（十二）重慶南路六號

## 聞一多的道路

史靖著

從『新月派』詩人轉變到成爲民主運動中最英勇最前列的戰士的聞一多先生，是知識份子和進步的自由主義者的最好模範。他所走過的道路，對於他的同輩和後輩，都是極有敎育意義的。這本傳記敍述聞先生的一生，直到他的爲人民而遇害。著者是聞先生的學生，又有點姻親關係，故能親切地瞭解聞先生，而其評價，則完全站在人民立場，故又極公平。全書十六章。（定價六・二〇元）

## 我在六十歲以前

馬敍倫著

本書是馬敍倫先生六十歲以前的自傳，從入書塾發蒙時寫起，經過辛亥革命，五四，三一八，及北伐之役，到抗戰，從這當中可以看到他治學治事一絲不苟的精神，以及堅定的意志，正直的態度和偉大的人格。本書若干部份，更是民國以來的珍貴史料。（定價四・八〇元）

## 藝術與社會生活

雪峯譯

在新興美學的領域內，普列漢諾夫的著作是一向被視爲基本文獻的，此書內容以其豐富的修養，論究藝術與社會生活的關係，反駁爲藝術而藝術的理論。著者根據自己的演講稿改寫而成，中譯本初版於一九二九年，這新版是經過了校改的。（定價五・〇〇）

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　李何林編　二五・〇〇元

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　侯外廬著　四〇・〇〇元

科學家奮鬥史話　曾寶菡譯　一六・〇〇元

生活進化淺說　周建人著　三・五〇元

中國外交史　錢亦石著　七・五〇元

中國啓蒙運動史　何幹之著　八・五〇元

近代世界政治史　錢亦石著　一二・〇〇元

科學與日常生活　陳原譯　五・〇〇元

上海按基本定價二千倍發售